

紅塵中有閒日月： 1920 年代黃旺成的社會觀察、政治參與及思想資源*

莊勝全**

摘 要

本文透過《黃旺成先生日記》剖析 1920 年代黃旺成的時代觀察、行動抉擇及思想脈絡，並分析身為臺灣本地知識分子，他是如何涉入由東京留學生所發起的政治社會運動的浪潮中。雖然每個人的生活情境、知識背景與思想觀念均不盡相同，然而若從個人因素、人生際遇及社會條件等情境加以檢視，應當更能理解人們在面臨重大歷史事件時，會如何應對與抉擇。

個人因素方面，日、臺人間的不平等待遇不僅是黃旺成辭去公學校教職的主因，同時也激發出他力爭平等的信念。因而 1920 年代初期在蔡蓮舫家擔任西席與資產管理人期間，黃旺成不僅關注與支持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也透過蔡家人際網絡結識以林獻堂為首的政治社會運動要角。1925 年回到新竹後，可提供固定薪資的臺灣文化協會講演團和《臺灣民報》記者工作，是最能達成理想又兼顧家庭生計的志業。

在人生際遇上，黃旺成在蔡家任職時也結識了一位來自南京的青年錢澤身，因而養成了他說中國官話、理解中國時勢，以及對白話新文學的興趣，成為他日後投身政治社會運動、撰寫報導及評介東亞時局的珍貴資產。

在社會條件方面，首先，1920 年代以白話漢文為主的《臺灣民報》茁壯為臺灣人發聲與策動輿論的管道，而黃旺成書寫時所使用混雜著臺灣話、日語及漢文的白話文體，成為他加入臺灣民報社的契機與條件之一。其次，1920 年代圖書館也被大量設置為象徵近代文明的「讀書裝置」，新竹州立新竹圖書館成為黃旺成獲取新知的重要管道之一，並將其閱讀所得透過書寫報導的方式，傳遞至讀者心目中。

關鍵詞：黃旺成、社會觀察、《臺灣民報》、思想資源、讀書裝置

* 本文初稿曾於 2014 年 11 月 20 日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高雄醫學大學主辦之「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發表，感謝與談人曾士榮教授及本刊匿名審查人給予諸多寶貴修正意見，特申謝忱。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來稿日期：2015 年 8 月 9 日；通過刊登：2016 年 3 月 11 日。

- 一、前言
 - 二、西席目睹之社會現象
 - 三、入紅塵：參與政治社會運動的過程與經歷
 - 四、閒日月：進行政治社會運動的思想資源
 - 五、結論
-

一、前言

具有多重知識傳統的臺灣史研究，1980年代以後隨著史料的發掘與史料範圍的擴大充實，研究取徑也轉為提倡臺灣中心觀點，以臺灣島嶼和人民歷史為主要問題意識，成為臺灣史領域的重要特徵之一。¹ 近十餘年來各色日記史料的面世與運用，更加突顯了此項研究特徵。隨著日記成為發掘最多的臺灣史史料，以及學界推行細緻注解與出版問世的腳步加快，截至目前臺灣史學界已舉辦過六次日記研討會，前三次（2000、2004、2006年）分別以臺灣總督田健治郎（1855-1930）之《田健治郎日記》、身兼豐原保正的櫟社詩人張麗俊（1868-1941）之《水竹居主人日記》，以及政治社會運動領導者林獻堂（1881-1956）之《灌園先生日記》，這三套業已完整出版的日記史料為主要題材，後三次（2010、2012、2014年）則從更為多元的各色日記來討論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及社會生活史之間的關係，² 其中兩次更集結成論文集出版。³ 這兩本論文集的內容均細緻討論記主的家庭生

¹ 張隆志，〈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臺灣史研究》16:4（2009年12月），頁161-184。

² 許雪姬，〈跋：《灌園先生日記》全套廿七冊出版完成記〉，收於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廿七）一九五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臺史所」〕、近代史研究所，2013），頁503-504。

³ 臺中縣政府文化局主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該局，2005）；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上冊）、（下冊）》（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08）。此六次日記研討會分別為：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主辦，「日記資料與臺灣史研究：以田健治郎日記為中心」（2000年12月15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史學會、臺中縣政府文化局合辦，「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2004年11月27-28日）；中研院臺史所主辦，臺灣省諮

活、人際網絡、⁴ 生活節奏、國族認同、經濟狀況、訴訟經驗、宗教信仰、醫療體育、音樂體驗等，唯最大的差別在於，2005年出版者單純以《水竹居主人日記》為考察對象，2008年出版者除了以《灌園先生日記》為主軸外，尚有蔣渭水等人的〈獄中日記〉、《水竹居主人日記》、《呂赫若日記》、《楊基振日記》，韓國的《求禮柳氏家日記》等已出版日記的相關研究，更介紹〈林紀堂日記〉、〈林癡仙日記〉、〈王叔銘日記〉等未出版日記的史料價值。

在此基礎上，目前有關日記史料的發掘、整理、出版與研究方興未艾，例如廖振富自2006年以來發現、梳理樸社要角傅錫祺（1872-1946）所遺世35冊的〈傅錫祺日記〉，不僅兼具重構日治時期「文學結社」過程與文學研究的價值，也為體察日治時期臺灣人在身體改造、刊物出版與書籍購讀等方面提供更多元的線索。⁵ 除了臺人遺留的日記外，日治時期在臺日人官吏與人士的日記也受到重視，如前述《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業已出版，而1930年代曾任臺北市尹、新竹州知事、高雄州知事等職務的內海忠司之日記也已面世，且已有初步關於其經歷、地方統治、總力戰體制、殖民地官僚日常生活之研究。⁶ 相對於田總督與

議會、明台高級中學、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協辦，「紀念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日記與臺灣史研究研討會」（2006年12月22-23日）；中研院臺史所、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辦，「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2010年8月19-20日）；中研院臺史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主辦，「日記與社會生活史學術研討會」（2012年11月16-17日）；中研院臺史所、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高雄醫學大學主辦，「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2014年11月20-21日）。

⁴ 在日記史料陸續面世後，記主本身或臺灣士紳的家庭／家族關係、家庭生活、人際關係和網絡等面向之研究，也多為研究者所關注，如上述兩本日記論文集裡即有收錄談論張麗俊日常生活中的女性關係和空軍上將王叔銘之人際關係，參見許雪姬，〈張麗俊生活中的女性〉，收於臺中縣政府文化局主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69-121；張淑雅，〈從日記看王叔銘的人際關係：蔣氏父子、僚屬與美軍〉，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上冊）》，頁123-166。另外，相關研究可見鄭政誠，〈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讀書生活〉，《兩岸發展史研究》7（2009年6月），頁45-72，文中作者也提供了學界運用《灌園先生日記》進行研究的大致成果；李毓嵐，〈林獻堂生活中的女性〉，《興大歷史學報》24（2012年6月），頁59-98；廖振富、張明權，〈《傅錫祺日記》所反映的親人互動及其家庭觀〉，《臺灣史研究》20: 3（2013年9月），頁125-175；李毓嵐，〈1920年代臺中士紳蔡蓮舫的家庭生活〉，《臺灣史研究》20: 4（2013年12月），頁51-98。

⁵ 廖振富，〈《傅錫祺日記》的發現及其研究價值：以文學與文化議題為討論範圍〉，《臺灣史研究》18: 4（2011年12月），頁201-239。該文也對日記史料的蒐羅、出版，以及在史學領域及文學領域的研究概況，有簡要評介。

⁶ 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京都：京都大学學術出版會，2012）；近藤正己、北村嘉惠編，《內海忠司日記（1940-1945）：總力戰體制下の台湾と植民地官僚》（京都：京都大学學術出版會，2014）。

內海知事為日人殖民地上級官僚，日本漢詩人初山衣洲（1858-1919）曾於1898-1904年間任職臺灣日日新報社漢文欄記者，並留有日記手稿，由於他在臺期間曾與兒玉源太郎（1852-1906）、後藤新平（1857-1929）等總督府官員直接接觸，並透過詩文和臺人唱和，因而從其日記可窺見日、臺官紳間之交遊情形，並反映臺北城周邊在臺日人的生活習慣，及未登載於報刊媒體上的日常事件。⁷ 在這些多元且重層的日記史料陸續面世後，而今已在社會史、政治史、精神史、音樂史、生活史、性別史、文化史等研究上，被廣泛討論與運用。⁸

職是之故，本文擬以正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陸續解讀、出版中的《黃旺成先生日記》為主，探究記主黃旺成（1888-1979）於1920年代所觀察到的社會現象，及其先後加入臺灣文化協會（以下簡稱「文化協會」或「文協」）與臺灣民報社，從事政治社會運動的心路過程。之所以選擇此日記文本作為論析素材，乃因這套日記除了有主編者許雪姬所指陳「第一部公學校教師所寫的日記」、「保存日記時間最長」、「擁有全臺性知名度記者、評論家的日記史料」、「豐富的生活史資料」、「能與其他日記檢證、互補（如《灌園先生日記》、臺史所藏蔡蓮舫家族資料）」、「新竹地區重要地方史料」等六大特點外，⁹ 尚有以下特色與價值：其一，在曾經參與政治社會運動的臺灣社會領導階層與知識分子所遺留的日記史料中，該日記不僅是記錄時間最早，也是唯一與1914年臺灣同化會、1915年臺中中學校運動等被標舉為政治社會運動之起點以降，以至1937年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宣布解散告終為止，年代全然疊合的史料，從中實可反映記主黃旺成在當時所感受到的時代氛圍。其二，在「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這條主線所構成的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下，目前對於文化協會本部及臺灣民眾黨（以下簡稱「民眾黨」）中央黨部的主導人物、舉行活動、議事及決策過程，雖然已有所瞭解，但對於1927年文化協會分裂後「新文協」、「臺灣共產黨」等臺灣左翼與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和主張，¹⁰

⁷ 許時嘉，〈〈初山衣洲日記〉初探：日治初期在臺日人社會與日臺交流（1898-1904）〉，《臺灣史研究》20:4（2013年12月），頁179-204。

⁸ 許雪姬，〈「臺灣日記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22:1（2015年3月），頁153-184。

⁹ 許雪姬，〈編者序〉，收於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一）一九一二年》（臺北：中研院臺史所；嘉義：國立中正大學，2008），頁x-xi。

¹⁰ 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15-28。

包括文化協會和民眾黨各地方支部的詳情與活動內容，甚至他們與中央部門的溝通、協調與互動過程，仍不甚明瞭。《黃旺成先生日記》中所載其熱烈參與文化協會新竹支部、民眾黨新竹支部活動之紀錄，以及 1927 年分裂後的新文協在新竹之活動內容，均可彌補這方面的不足之處。其三，黃旺成長子黃繼圖（1912-1974）也留有自中學時代寫起，總計 37 冊的〈黃繼圖律師日記〉（1929-1972），且兩部日記記錄年代多所疊合。透過交相比對父子兩代的日記，不惟可見臺灣人家庭裡的日常生活狀況、成員間互動及相互間的觀感，亦可窺知不同世代臺人的世界觀與歷經共同歷史事件時心境上的異同。¹¹

如今，透過追索日記、後人所立的傳記和追憶，¹² 我們已能掌握黃旺成大致的人生圖像如下：1888 年生於新竹市郊赤土崎，1895 年入私塾學習漢學，1903 年才入新竹公學校就學，1907 年成為該校第五屆畢業生，並考取臺灣總督府（以下簡稱「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1911 年 3 月，成為該校第五屆畢業生，分發回新竹公學校擔任訓導。1918 年辭去教職，1920 年應臺中蔡蓮舫（1875-1936）家族之邀，擔任家教並兼任資產管理人。1925 年 3 月辭職返鄉，與新竹同窗舊友齊力推行各項社會事業，並於 11 月加入文化協會。隔年 12 月，入臺灣民報社擔任記者，1927 年文化協會分裂後，名列民眾黨五名創立委員之一。1932 年 8 月，退出《臺灣新民報》，轉往南京、上海經商，但並未成功。1935 年 11 月，當選新竹市會議員。1939 年被控宣傳反日言論遭拘禁近一年。1945 年戰爭結束後，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新竹分團主任，並擔任《民報》總主筆。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民報》被查封，避走南京、上海，至隔年年初才返臺。同年 6 月，受邀修纂《臺灣省通志》，並於 1949 年遞補為臺灣省議員。1952 年 10 月，再受聘為新竹縣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編纂《新竹縣志》，1957 年 5 月退休。1979 年去世，享壽 92 歲。

¹¹ 如曾士榮以〈黃繼圖律師日記〉重構黃繼圖人生各個階段的經緯，是目前少數使用該日記研究的成果。參見曾士榮，《近代心智與日常臺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1912-1955）》（新北：稻鄉出版社，2013）。

¹² 莊永明，〈輿論界的尖兵：黃旺成〉，收於莊永明、張炎憲、李筱峰編，《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五冊）》（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頁 85-99；新竹市志編纂委員會編，《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新竹：新竹市政府，1996），頁 151-153；張德南，〈堅勁耿介的社會運動家：黃旺成〉（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9）；黃繼文口述、陳鳳華整理，〈父親黃旺成的追憶〉，《竹塹文獻雜誌》10（1999 年 1 月），頁 41-57。黃旺成在日治時期的人生略歷，另可見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該社，1943），頁 149。

由於黃旺成豐富的一生並留予後世為數頗豐的日記資料，各個不同的研究層面中都可見其身影：在記者筆耕生活和戰後從事的修志工作方面，張炎憲與陳萬益指出黃旺成在《臺灣民報》和《民報》內所擔任的角色，並將其筆鋒擴及志書的歷史編纂；¹³ 在政治社會運動的參與上，黃美蓉大略說明黃旺成政治參與之概況，而吳沁昱則勾勒自戰前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推動地方議員選舉以降及至戰後，黃旺成在新竹自治選舉與議會運作上所扮演的角色；¹⁴ 在日常生活與生活節奏的面向上，筆者和許俊雅均選擇其閱讀生活為主軸，唯前者僅聚焦於公學校教師時期，後者則延伸至 1924 年的閱讀經驗。至於黃麗雲則以黃旺成的日記為例，說明其生活節奏及大正時期日本的祝祭在臺灣實行之過程；¹⁵ 至於國族認同的課題方面，曾士榮以黃旺成為代表個案，說明 1920 年代臺灣國族意識的形成過程，及戰前「本島人」至戰後「本省人」的身分轉換和認同問題。¹⁶ 上述研究或多或少均點出，1920 年代前後的生命歷程，是黃旺成人生重要的關鍵轉折期，他自身也在 1967 年接受王世慶口述訪問時表示，回顧其生涯，最感到愉快、有意義的時期，就是在臺灣民報社擔任記者及參與文化協會、民眾黨活動之時，因為這段期間他所發表的言論獲得民眾同感者頗多，自己思考的問題也與民眾要求相符合。¹⁷ 然而無論前述研究或黃旺成受訪當時，均未能言明為何他會選擇步上這條可謂其畢生精華的人生旅程。特別是在 1920 年代政治社會運動的發展中，相對

¹³ 張炎憲，〈黃旺成的轉折：從社會參與到纂寫歷史〉，《竹塹文獻雜誌》10（1999年1月），頁6-28；陳萬益，〈臺灣報業史上的一等評論：論黃旺成的「冷語」「熱言」〉，《竹塹文獻雜誌》10（1999年1月），頁29-40。

¹⁴ 黃美蓉，〈黃旺成與其政治參與〉（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吳沁昱，〈新竹市自治選舉與議會運作：以黃旺成政治參與經驗為中心（1935-1951）〉（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¹⁵ 莊勝全，〈腹有詩書氣自華？：黃旺成公學校教師時期的閱讀生活〉，收於川島真、松永正義、陳翠蓮主編，《跨越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第四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11），頁269-302；許俊雅，〈知識養成與文學傳播：《黃旺成先生日記》（1912-1924）呈現的閱讀經驗〉，《東吳中文學報》27（2014年5月），頁267-307；黃麗雲，〈日治大正期臺灣俗信與日本祝祭在臺施行情況：黃旺成的日記情境摸索與解析〉，《臺灣史料研究》38（2011年12月），頁83-134。

¹⁶ 曾士榮，〈一九二〇年代臺灣國族意識的形成：以《陳旺成日記》為中心的討論（1912-1930）〉，《臺灣文學學報》13（2008年12月），頁1-64；Shih-jung Tzeng, *From Hōnto Jin to Bensheng Re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9).

¹⁷ 王世慶訪問，〈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收於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臺灣口述歷史〉（臺北：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1991），頁96。王世慶先生的訪談內容包括生涯憶述、對重大歷史事件的記憶，以及日本統治下新竹社會環境與狀況等特殊性質的回憶。

於留學日本的知識菁英因感受時代思潮、接觸相關團體建立人脈、習得最新的殖民地政策學，而率先發起政治社會運動並擔任核心成員，¹⁸ 未受過留學教育的臺灣本地知識分子，究竟是在何等社會脈絡與歷史情境下，才得以進入這股風起雲湧的浪潮之中，黃旺成的經歷實可提供一個參照的側面。因此，本文將透過其 1920 年代的人生閱歷和紀錄，剖析其筆下的時代觀察和行動抉擇，並闡釋他做出選擇的思想脈絡。

二、西席目睹之社會現象

1917 年底，由於新竹公學校內的語言使用問題和日、臺教職員之間的緊張關係，心有不平的黃旺成遂於隔年辭去已擔任七年的教職。¹⁹ 之後，他為了生計曾與友人李良弼（1889-1944）在新竹市南門組織「良成商會」，經營購自鈴木商店的米、糖、麵粉、石油等商品批發，²⁰ 但因經營不善於 1919 年元月底關閉。²¹ 同年 7 月，再於新竹信用組合對面開設「元豐商行」，卻也只經營三個月就熄燈。²² 在生計的考量下，1920 年黃旺成決定應蔡蓮舫的邀請，擔任其子蔡伯淙（1915-1954）的家庭教師，並幫忙蔡家事業的帳項整理。因而在 1920 年代前半期，他離開故鄉新竹，將生活的重心移往臺中，他不會料到，這段離鄉背井的人生轉折竟讓他順路搭上了政治社會運動的順風車。在臺中謀求生計的那些年，一方面，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下簡稱「議會設置請願」）和文化協會有如車之雙輪，帶動臺灣人爭取政治、法律地位平等及文化向上提昇的政治社會運動方興未艾；另一方面，黃旺成的東家蔡蓮舫不僅曾參與 1915 年設置第一間專供臺人子弟就讀的

¹⁸ 若林正文著，顏杏如、陳文松譯，〈大正民主與「臺灣議會」〉，收於若林正文著、臺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臺北：播種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 75-136；紀旭峰，〈大正期台湾人の「日本留学」研究〉（東京：龍溪書舍，2012）；陳翠蓮，〈大正民主與臺灣留日學生〉，《師大臺灣史學報》6（2013 年 12 月），頁 53-100。

¹⁹ 〈陳訓導送別會〉，《臺灣日日新報》，1918 年 4 月 5 日，第 6 版；王世慶訪問，〈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頁 73-85；曾士榮，〈一九二〇年代臺灣國族意識的形成：以《陳旺成日記》為中心的討論（1912-1930）〉，頁 14-17。

²⁰ 〈新竹通信 開店〉，《臺灣日日新報》，1918 年 6 月 17 日，第 2 版。

²¹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七）一九一九年》（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10），頁 24。

²²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七）一九一九年》，頁 156、240-241。

「臺中中學校」的設立運動，也和當時運動領導者林獻堂為代表的霧峰林家，有事業和姻親關係而常相往來。黃旺成往往能藉由蔡家絡繹於途的訪客與綿延不絕的人際網絡，得知當時運動狀況和社會脈動，而他也自言與林獻堂有關時事的談話和討論，彼此在認知和理念上頗為契合。²³

(一)「臺灣兩大思想之潮流」：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與內地延長主義

1920年代由於資本主義擴張、獨占資本發達，加以一次大戰後自由主義及民族自決意識的抬頭，使臺灣社會內部從屬於日本資產的領導階層走向分化，進而梳分出合作主義（新買辦）與民族主義者兩個派別，所顯示的正是地主階級掙扎在民族主義與殖民統治調適間的衝突矛盾。²⁴ 進入蔡蓮舫家族幫忙後，黃旺成首先感受到的社會氛圍，即為在議會設置請願過程中，臺灣社會領導階層間日益分殊。例如北部的林明德（1878-？）、黃純青（1875-1956）等仕紳在州協議會上以緊急動議聲明北部紳士不參與議會設置請願之事，東家蔡蓮舫便深鄙之，認為這是親日派的劣根性；²⁵ 而辜顯榮（1866-1937）則諷刺林獻堂推行議會設置請願是無氣節的表現，若不停止，最後必上絞臺、下場淒慘。²⁶ 這樣的氛圍明顯影響到領導階層彼此間的人際關係，1921年4月林獻堂赴日向帝國議會進行請願返臺後，即應同志之邀拜訪各處，將抵達臺中時，蔡蓮舫曾諮詢黃旺成是否前往迎接林獻堂一事，最後在黃的建議下往迎，但態度較傾向總督府的林烈堂（1876-1947）、吳鸞旂（1842-1922）等中部仕紳則不敢前往。²⁷ 親日派仕紳和議會設置請願人士之間最為對立的時刻應屬1923-1924年間，先是1923年7月2日，報載辜顯榮與林子瑾（1878-？）等為抵制文化協會，組織了以「矯正時代思想之謬誤者，將以使人民咸歸於正」為目的的「公益會」，這樣的局勢讓黃旺

²³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年》（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12），頁240。

²⁴ 若林正丈著、臺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頁32-33；荊子馨（Leo T. S. Ching）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124-126。

²⁵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年》，頁75-76、122。

²⁶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年》，頁122；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年》（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12），頁262-263。

²⁷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年》，頁144-145。

成感悟「臺灣兩大思想之潮流，不勝浩嘆」，²⁸亦即當時議會設置請願人士爭取的是維持臺灣特殊性，並實行憲政與民權的「臺灣議會」；然而辜顯榮等親日派仕紳則是支持總督府所宣稱的「內地延長主義」之施政。在這樣的感嘆之餘，黃旺成本人也對公益會暗中破壞議會設置請願與文化協會活動的行為感到不滿，因而同年8月上旬公益會在臺中舉辦招待宴會時，辜顯榮多次遊說蔡蓮舫擔任該會臺中支部長，黃旺成力勸蔡氏應不偏不黨，斷然拒絕支部長一事。²⁹黃旺成雖然建議蔡氏拒絕支部長職務，不過卻和蔡氏一同應邀出席公益會的宴會，他的想法是「蓋欲觀其演說內容及眾人心理」而非贊成加入，未料辜顯榮卻欲以此為憑據，藉由媒體散布蔡蓮舫承諾支部長的報導。為此，黃旺成特意打電話囑託在《臺灣新聞》任職記者的友人黃爾璇為之闢謠。³⁰日後公益會屢屢成為黃旺成和友人與訪客間的話題，互相指斥辜顯榮與參與仕紳之人格，及該會與官方的默契和黑幕。³¹

1924年6月中旬，以蔣渭水(1891-1931)、蔡培火(1889-1983)、洪元煌(1883-1958)、李山火為請願委員的第五次議會請願運動盛大展開，林獻堂特意出席並致詞鼓勵，蔣渭水等人抵達東京後，也一如往常受到東京新民會、臺灣青年會會員的熱烈歡迎，更有人高舉「尊重民意」、「自由平等」、「撤廢差別」、「民族自決」等標語，《東京日日新聞》、《朝日新聞》等報社也在社論或報導中刊登相關記事，受到中央前所未有的注目。同時間辜顯榮等公益會幹部為了表明請願運動只是少數人策動而非所有臺人之意願，便於臺灣日日新報社集合，經由社長井村大吉之斡旋，作出在臺北召開「全島有力者大會」的決議，並於6月28日在辜顯榮自

²⁸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年》(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12)，頁244-245、262。公益會於1923年7月16日在辜顯榮自宅大和行舉行第一次集會，同年11月8日在臺北鐵道飯店舉行發會式。相關報導及照片詳見〈文化協會に對抗して 公益會創立されん〉，《臺灣日日新報》(以下省略)，1923年7月2日，第5版；〈辜氏創立公益會〉，1923年7月3日，第6版；〈公益會の創立總會〉，1923年7月18日，第9版；〈公益會創立會議〉，1923年7月19日，第6版；〈公益會發會準備委員會〉，1923年11月8日，第2版；〈公益會發會式〉，1923年11月10日，第7版。

²⁹ 不僅辜顯榮等人，警方的特務也曾勸誘蔡蓮舫接任支部長。參見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年》，頁280-282、288、365。

³⁰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年》，頁283。

³¹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年》，頁286、292、296-297、299、305。1925年1月18日，當黃旺成在《臺灣日日新報》讀到前清郵傳部尚書陳璧讚揚辜顯榮是通權達變的臺灣英雄，並有「基隆迎接日本兵 引兵南進 說服劉永福軍 救陳秋菊土匪團 造保良局 興鹽、糖二業」等六大功的報導時，更是嗤之以鼻。參見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13)，頁28。該報導原文見陳璧，〈耀星辜先生六十雙壽序文〉，《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1月18日，夕刊第4版。

宅舉行，共有 38 位公益會重要幹部出席。相對於此，林獻堂親上前線率領文化協會成員，於 7 月 3 日在臺北、臺中、臺南分別召開「全島無力者大會」反制，三地參與人數多達數千人，可見公益會與有力者大會的召開，反而助長了議會設置請願與文化協會的聲勢。³² 黃旺成也盛讚「無力者」一詞甚為新穎、妥切而能產生共鳴，「蓋會社作事都以有力者為本位，而不知無力者比有力者之人數多有數百倍也」，他也參加了臺中場的無力者大會，並將會議流程與內容記錄於日記中，休假回新竹時也轉述大會的情形予友人知曉。³³

（二）懷柔與威壓並施的官方壓力

1920 年代政治社會運動推行的過程中除了來自親日派仕紳的抵制，當中更少不了來自總督府的分化與壓力。蔡蓮舫曾數度被臺中市尹川中子安治郎要求加入反對設置臺灣議會的行列，只是同樣在黃旺成力勸下，堅拒加入反對陣營，惟遵從官方命令不再參與相關活動。因此，當蔡培火至蔡蓮舫宅勸募《臺灣》雜誌的股份時，蔡氏雖出資襄助卻要求不掛名。³⁴ 1922 年 9 月 28 日，林獻堂偕同楊吉臣（1852-1930）、林幼春（1880-1939）、甘得中（1883-？）、李崇禮（1874-1951）、洪元煌、林月汀（1870-1931）、王學潛（1867-1927）等八人到總督府謁見總督田健治郎，在徵詢總督對議會設置請願的意見時，田總督表示請願絕對不會成功，希望停止運動而無意用官方力量進行壓迫，基於情誼勸告林獻堂不要作徒勞無功之事，林氏則表示明白總督之意，「希望能符尊意」。³⁵ 這場對談內容巧妙地為當局所運用，偽稱林獻堂已保證停止議會設置請願，並透過媒體大肆宣傳，不僅引

³² 有關有力者大會與無力者大會的背景與相互對抗過程，詳見連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臺灣政治運動史》（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頁 125-128；許世楷著，李明峻、賴郁君譯，《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 312-315；林柏維，《臺灣文化協會滄桑》（臺北：臺原出版社，1993），頁 206-210。

³³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年》（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13），頁 211、213-214、222、224。1924 年 7 月 3 日當天會議由葉榮鐘主持開會，並選舉林獻堂為議長，除了說明無力者大會的主旨書外，尚有林幼春「無力者之自白」、蔡珍曜「力行一致」、黃周「放大眼光」、林載昭「提議見舞患如」等專題演講。

³⁴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年》，頁 222、226；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年》，頁 17-18。警方的特務也曾出言表示會用真壓迫手段對付文化協會。參見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年》，頁 268。

³⁵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年》，頁 318-319。

來蔣渭水等人及東京的臺灣留學生交相指責林氏變節，³⁶ 黃旺成透過報端得知此事時，也在日記中感嘆寫下「噫！古人云聲名定蓋棺，不我欺也。蓋志士之節，能不屈於權勢、不顧乎權利，方能有終。林氏若果變節，則予為之宣傳其平等主義者，亦覺有不識人之憾也」。³⁷ 此事被稱為「八駿事件」或「犬羊禍」，是總督府懷柔分化計策的一環。

事後，蔡培火與蔣渭水欲計畫組織以設置臺灣議會為直接目標的團體「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卻又引來總督府直接以強硬手段壓制的「治警事件」。1923年1月30日，蔡、蔣等人向臺北州北警察署提出期成同盟會的結社申請未獲同意，遂將活動移到東京，2月21日在東京重新成立。然而總督府卻以「治安警察法」第8條第2項為由，於同年12月16日展開全島大搜捕，共計有99人遭搜查、扣押或傳訊。與「八駿事件」不同的是，《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聞》、《臺南新報》三家報社對整起事件保持緘默、隻字未提，反而更令臺灣民眾驚慌失措。³⁸ 根據黃旺成的觀察，臺灣各地因寒蟬效應而反應冷淡，唯有臺中清水民眾最為激憤，12月21日當被檢束人士集中送往臺北時，清水仍有十餘名民眾前往火車站為蔡年亨（1889-1944）、蔡梅魁、蔡先於（1893-1950）送行，據說蔡梅魁還在火車上發表演說辱罵同行的巡查云云。³⁹ 黃旺成對治警事件的法律見解為，從「時效問題」觀之，若組織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違反治安警察法，則只有首次向臺北北署提出的結社申請被禁止後仍繼續活動才說得通，但當時活動者被拘捕，則是向東京早稻田警署申請結社獲得允許後發生，並無所謂違法結社的問題。⁴⁰ 果不其然，1924年8月18日，一審判決宣判治警事件所有被告通通獲判無罪，黃旺成接獲消息後，心情「為之一快」。⁴¹ 然而檢察官三好一八不服提出上訴，10月29日二審，蔣渭水、蔡培火、蔡惠如（1881-1929）、林呈祿（1887-1976）等十三人被判有罪，被告隨即提出上訴。⁴² 隔年2月20日三審宣判，仍維持二審判

³⁶ 許世楷著，李明峻、賴郁君譯，《日本統治下的臺灣》，頁292-297；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頁79-81；林柏維，《臺灣文化協會滄桑》，頁196。

³⁷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年》，頁20。

³⁸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頁81-83。

³⁹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年》，頁426-432。

⁴⁰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年》，頁80、82、84。

⁴¹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年》，頁268-269。

⁴² 黃旺成認為「文協早已受有罪判決」，即未審先判、羅織成獄之意。參見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年》，頁342。

決，蔣渭水等人決定不再上告、接受判決入獄服刑。隔日清水人蔡惠如返抵臺中時，同志同行者有二十餘人、迎接者百餘人，黃旺成也擠身其中，並述當時沿途爆竹聲、呼萬歲聲不絕於耳，讓他感動道「足見臺灣人心之不死也」。⁴³的確，雖然判決過程中一度打壓了議會設置請願的聲勢，但判決確定後，反而激起臺灣民眾關心政治的熱潮，不僅第六回議會設置請願的連署人數激增，參與文化協會活動的聽講人數也大幅成長，同時也反映在《臺灣民報》的銷售數字上。⁴⁴1924年9月1日和11月11日，該報各發行了治警事件特別號詳盡報導事發經過及法庭上的攻防，因而使其發行數激增至突破1萬份，甚至超越日人創辦的日刊報銷量。⁴⁵

（三）新臺灣教育令與黃繼圖共學事

根據葉榮鐘（1900-1978）的描述，1920年代臺灣的政治社會運動之所以蓬勃發展，1914-1915年間，以林獻堂為中心的中部資產家所發起「臺中中學校設置運動」實為其先聲。⁴⁶這場運動不但突破了殖民政府將普通教育侷限於小學程度的限制，也使總督府意識到具體規劃殖民地教育制度的迫切必要性，因而在政府內部開始討論殖民地教育基本法。1919年1月，以勅令形式公布的「臺灣教育令」，成為最初明文化的臺灣殖民地教育基本法。同年3月1日朝鮮發生「三一獨立運動」，迫使總理大臣原敬（1856-1921）對殖民地統治正面打出「內地延長主義」政策，牽動了殖民地教育體制的修改，為了在教育政策裡導入內地延長主義原則，1922年2月總督府再度以勅令20號公布「新臺灣教育令」。新教育令的特殊之處在於「共學」相關規定，即中等學校以上廢除日本人和臺灣人的區別，採取共學制度；初等教育也改為依據「國語」（日語）常用與否，作為區分公學校和小學校的就讀標準，而非之前純以種族為依據。⁴⁷

⁴³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68。有關治警事件的判決過程，詳見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頁83-87。

⁴⁴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頁87-89。

⁴⁵ 楊肇嘉，〈臺灣新民報小史〉，收於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4版），頁417。

⁴⁶ 葉榮鐘，《葉榮鐘全集 1：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上冊，頁57。

⁴⁷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該會，1939），頁356-357；吳密察，〈從日本殖民地教育學制看臺北帝國大學的設立〉，收於吳密察，《臺灣近代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頁159-164。

曾經有過擔任公學校教師經驗，又在蔡蓮舫家族中擔任家教的黃旺成，對於總督府實施的教育政策十分關注，同時也十分看重子女的教育。他曾在一封寄給新竹摯友張式穀（1890-1977）的書信中，痛批「政府對島人之高等教育不施，人才枯竭，雖有二、三有志留學青年，而政府視全蛇蠍，可當政府之任用者無有也」；⁴⁸ 某次讀到《臺南新報》的社說〈教育亡國論〉時，也寫下「蓋學問乃欲造就高尚人格，使人生得有意義之存活。至於生活上之必需，要從勞動之力而得也。受教育者必欲以所學求生活之道而厭勞動者，我恐生產日減，國家必不可問矣」的評論。⁴⁹ 因而寓居臺中期間，黃旺成雖然不能與家人長時間相處，但他仍相當重視子女的教育，當長子黃繼圖於1919年入新竹公學校（1921年改名為新竹州新竹第一公學校）就讀而逐漸習得書寫能力之後，黃旺成便要求他規律地寄家書與明信片到臺中，報告新竹家中的大小事務並練習寫作能力。⁵⁰ 此外寒、暑假期間，黃旺成也會帶黃繼圖到臺中同住，親自督導他的課業，例如1921年夏天，黃旺成指導黃繼圖傳統漢學，主要課業內容為記誦《左傳》、《史記》、《唐詩》、《四書》以及習字。⁵¹ 隔年新臺灣教育令公布後，黃旺成敏銳地感受到共學的教育潮流，便大力敦促黃繼圖轉入新竹小學校。1922年暑假，黃旺成教導黃繼圖的自習內容，除了《史記》外，轉為加強其日語能力為主，授以平日公學校教育中所接觸不到的小學校《小學讀本》（卷五）之〈大日本〉、〈中村君〉、〈八岐大蛇〉等課文內容。⁵² 隔年，教授更全然以《小學讀本》為教材，並特意以涉及日本歷史與文化的課文為主，如源賴朝建立鎌倉幕府的關鍵一役「屋島合戰」、〈萬じゅの姫〉（萬壽姬救母）等，同時再為黃繼圖印製與裝訂第六、七卷的《小學讀本》以供學習。這些涉及日本歷史的課文不但篇幅長、內容也較為艱澀，教導起來頗費力氣，令黃旺成欣慰的是，黃繼圖天資聰穎、善於理解，「其習得之敏捷，雖大人不及也」，但也讓自身感受到「予歷史久已忘記，頗艱於回答。兒之聰明堪喜，己之學問荒廢實可憂也。為教育兒曹計，可不勉乎哉」。⁵³

⁴⁸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年》，頁316。

⁴⁹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年》，頁362。

⁵⁰ 曾士榮，《近代心智與日常臺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1912-1955）》，頁24。

⁵¹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年》，頁217-220、222-225。

⁵²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年》，頁226-231。

⁵³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年》，頁4、12、15、73-74、78、80、254、266。

在親身監督黃繼圖的學習狀況之餘，黃旺成每逢返竹便熱切詢問共學事宜，如新竹第一公學校的教師林呼爐、新竹小學校長吉田兼造（1873-？）、新竹第二公學校長小山六郎、新竹尋常高等小學校長木村凡夫（1890-？），以及友人鄭元璧（1891-？）、戴良等人，都是他探詢、商討的對象。1923年4月4日，黃繼圖獲准轉學至新竹小學校，黃旺成託付友人張傑、張式毅代辦共學手續。⁵⁴ 同年9月，黃繼圖轉入新竹小學校就讀四年級，據同為共學生的同班同學鄭翼宗回憶，同班40名學生當中，只有8名家庭較為富裕且考試通過而錄取的本島人共學生，黃繼圖也開始有機會與穿著和服的日人小學生接觸並獲得較為具體的「日本」經驗，對他往後的人生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⁵⁵ 此實為父親黃旺成大力奔走有以致之。黃繼圖入學後，黃旺成曾親自到小學校參觀其上課情形，而臺中友人蔡遜庭得知黃繼圖轉學成功後，便買贈小學五年級的參考書，黃旺成樂曰「喜甚勝過身受其賜者」，⁵⁶ 對其子教育的關愛之情溢於言表。

黃旺成一方面支持議會設置請願陣營所標舉憲政與民權的立論基礎，一方面又呼應日本當局為了推動內地延長主義而推行的共學制，大力促成黃繼圖與日人子弟共學，其舉措雖看似矛盾，實則反映出日治時期臺人在選擇臺灣特殊性與內地延長立場的同時，所面臨更複雜的意識形態內涵之問題。誠如論者所言，同化政策的內涵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一種模糊且多方包容的殖民策略，因此其所具備的工具性、兩義性與流動性特質，不只是用來控制與因應被殖民者日益升高的要求而發展出的殖民策略，也留予被殖民者對同化概念的論述空間。⁵⁷ 陳培豐指陳在「同化於（近代）文明」與「同化於（日本）民族」兩種不同的精神內涵中，由於殖民政府所提供的國語教育是臺人接觸近代文明的唯一窗口，因而臺灣社會展露對於新式教育的渴望，並因勢利導接受「同化」教育以逐步削弱殖民地的差

⁵⁴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年》，頁70、83、136、141、168、197、236。除了長子黃繼圖之外，次子黃繼舜也得以入新竹小學校就讀。

⁵⁵ 鄭翼宗，《歷劫歸來話半生：一個臺灣人教授的自傳》（臺北：前衛出版社，1992），頁93；曾士榮，《近代心智與日常臺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1912-1955）》，頁24、36。

⁵⁶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年》，頁375-376；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年》，頁152。

⁵⁷ 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譯，《「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32-41；荊子馨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頁129-156。

別統治。明治時期，總督府對於臺灣社會的期望採取抑制教育普及的方式，嚴格掌握教育機關數量；至大正時期改採普及國語教育手段，然而卻將教材內容的文明面向空洞化，並將平等化的基準改設為「同化於民族」，臺灣教育令的頒行正是將這樣的想法具體法制化的結果，而新臺灣教育令更標榜內地延長的精神，不僅強化了「同化於民族」的意識形態，更使得中等學校以上的教育資源為日本人所壟占，壓制臺人走向文明化的企圖。面對初等教育漸次普及但教學內容卻趨於空洞化的情勢，臺人採取「一面接受一面抵抗」的方式來探求文明化，即盡可能利用國語教育作為「同化於文明」的窗口，但也力圖擺脫內地延長主義所帶來的文明化困境，透過推動表達自身民族立場的政治社會運動，打造一個具備近代文明條件的臺灣社會。⁵⁸ 體現在黃旺成身上，即他一方面在新的教育體制下，力促長子進入較優良的日臺共學教育環境中追求向上攀升的管道，另一方面也投身政治社會運動的浪潮中，為臺灣社會的近代化盡一己之力。

三、入紅塵：參與政治社會運動的過程與經歷

如上所述，總督府對於議會設置請願與文化協會的活動，採取柔性分化和強力彈壓雙管齊下的壓制策略，透過八駿事件讓文協內部與東京留學生對林獻堂立場產生質疑，並運用治警事件取締文協重要幹部，以阻撓請願活動進行。1925年2月向日本帝國議會進行第六次請願時，林獻堂決定躬親出馬，率領楊肇嘉（1892-1976）、邱德金（1893-？）及葉榮鐘赴日提交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希冀對內可以澄清同志間的誤會，對外重整旗鼓、向總督府宣示不被收買的決心。林氏此舉果然激勵民眾信心，3月底返臺後，便獲全臺各地演講之邀，其中又以4月16日在彰化二林場最為轟動。新竹青年眼見這樣的社會氛圍，也希望邀請林獻堂與文化協會到新竹演講，並在當地成立文協支部；另一方面，文化協會自1921年成立以來，已在臺灣各地舉辦過各項活動，唯獨沒有到過新竹，莫說在當地未設支部，甚至連一次文化講演會都沒有舉辦過。⁵⁹ 在此般情況下，斡旋新竹青年與文化協會兩相

⁵⁸ 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譯，《「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頁217-384，第五、六章。

⁵⁹ 葉榮鐘，《杖履追隨四十年》，收於葉榮鐘，《葉榮鐘全集2：臺灣人物群像》（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頁42-46。

結合的關鍵，就是甫於 1925 年 3 月初，辭去蔡蓮舫家西席職務、回到新竹的黃旺成。

（一）文協入竹

黃旺成在蔡蓮舫家的工作經歷，以及與林獻堂等核心人物互相認識的過去，為新竹青年所知曉。⁶⁰ 1925 年 4 月 30 日，新竹青年學金木率先前往拜訪黃旺成談論社會事業（愛愛寮）、文化講座、青年文庫等事，數日後，又帶了當時從事木匠工作的吳廷輝同訪，討論將文化協會的活動引進新竹，以及拜會林獻堂的相關事宜，並帶來文化協會入會介紹書，希望透過黃旺成的介紹加入該會。另外，除了與林獻堂積極聯繫，文化協會成員王敏川、施至善、吳清波也來與學、吳二人簽訂契約，交涉在新竹成立《臺灣民報》取次店（經銷店），因此他們請黃旺成幫忙斟酌購讀廣告的文案。⁶¹ 5 月底，黃旺成應學金木之託作信予林獻堂，要求林氏在文協活動後多留新竹一日，與當地人士交換意見。在新竹青年積極奔走與黃旺成的居中協調下，6 月 7 日文化協會林獻堂一行人抵達新竹，到處都有如迎神一般的爆竹迎接，在北門外吳廷錫宅所舉行的首度文化講演，一共吸引了兩千多位聽眾，為新竹空前之盛況。吳廷輝致開會詞（同樣由黃旺成潤飾而成）後，依序有林獻堂「文化協會的使命」、蔡惠如「迷信的打破」、蔡式穀（1884-1951）「社會制裁與法律」、王敏川（1887-1942）「革新人心，改造社會」、施至善（1881-？）「教育的平等」等講題。會後隔日，林獻堂、蔡惠如、蔡式穀、楊肇嘉、陳逢源（1893-1982）、陳虛谷（1896-1965）、葉榮鐘等也特地與新竹青年會交換意見。⁶² 首度入竹即獲熱烈迴響，文協打鐵趁熱，同年 7-9 月間接連舉行第二場文化講演、東京留學生團講演會、留學生文化劇「良心的戀愛」等活動，再於 10 月 9 日正式成立文化協會新竹支部。⁶³

⁶⁰ 王世慶訪問，〈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頁 86-87。

⁶¹ 後來由吳廷輝擔任《臺灣民報》新竹批發所的取次人（經銷商），參見門新太郎編，《新竹州下產業統計商工業者案內》（新竹：新竹商工名簿錄發行所，1925），頁 41。

⁶²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 142-143、147-148、150-152、156、159、160-163、171-173、178-179、182-186。林獻堂本身也相當重視新竹首度的文化講演活動，因此在事前特地發函邀請全臺各地的重要同志赴會，講演當日由南部來的有蔡培火、陳逢源，北部來的有蔣渭水、石煥長、王敏川，中部則由林獻堂率領林幼春、蔡惠如、洪元煌、莊垂勝、陳虛谷和葉榮鐘等人與會，可謂盛極一時。參見葉榮鐘，〈杖履追隨四十年〉，頁 203-204；〈新竹盛開文化講演會〉，《臺灣民報》59（1925 年 7 月 1 日），頁 5。

⁶³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 200、206-207、228、240、252-254、278-280、304、310-312。

文化運動的風潮雖然在黃旺成協助下吹進新竹，他也曾在新竹支部成立當天應邀上臺演講「活動」，但一開始卻沒有直接和學金木、吳廷輝等青年一齊行動，也不直接參與文化協會活動，更沒有加入該會的打算。事實上，當學、吳二人來請託黃旺成介紹加入文協時，他甚至覺得不妥，轉勸他們將熱忱放諸於黃旺成和友人正認真推動、改造的「竹聲會」（下述「新竹青年會」的前身）；之後，二人更要求黃旺成出任文化協會新竹支部長一職，又遭他嚴拒。⁶⁴ 為何在臺中任職時對議會設置請願與文化協會的文化活動大為關注與讚許，黃旺成在文化協會的勢力要進入新竹時，會有如此反應呢？這可從文化協會舉辦完新竹第一次文化講演後，學金木代楊良（1892-？）向黃旺成交涉一面擔任楊良的家庭教師，一面從事文化協會活動之情事，黃旺成即席拒絕的理由看出端倪，他認為「此後希望脫離依賴的生活，要發揮獨立自尊的精神。至於文協予雖贊成其主旨，而我認定新竹青年會有獨立存在的必要，所以決定盡力於青年會，不能兼及文協」。⁶⁵ 具體而言，黃旺成的考量約有以下兩端，且與他在蔡蓮舫家任職的經歷有深刻關係：其一，擔任西席雖能維持收入，但寄人籬下與其本性不合，因此將往後的目標放在經營獨立事業上；⁶⁶ 其二，他在臺中任職時親眼目睹文化協會遭逢來自總督府的各式壓力，因此新竹的文化狀況雖有革新之必要，但並非貿然引進受政府高度關切的文化協會勢力，而應透過新竹青年會循序漸進之努力。黃旺成此後生活之重心，確實也朝這兩個方向努力，具體成果為和友人共同成立「友聯機織工場」經營織布業，以及將「竹聲會」改組為「新竹青年會」。

（二）友聯機織工場、新竹青年會與修養會

黃旺成在臺中蔡家任職期間，家中成員先後過世。先是父親陳送（1862-1921）於1921年4月間去世，8月二弟陳辛庚（1895-1921）病故，9月其妹陳氏錢（1902-1921）自縊，11月同父異母之妹陳氏雪娥夭亡（1918-1921）。1923年5月，大弟

⁶⁴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147-148、159-160、163。

⁶⁵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189。

⁶⁶ 黃旺成自言他離開蔡蓮舫家的動機為「第一因會社現時不大有事可辦 吾之性情又不願尸位素餐 第二因子家中乏人主宰 兒子教育不能照料」。參見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年》，頁402-403。李毓嵐則分析，黃旺成之所以從蔡家離職，與蔡蓮舫兩位養子蔡伯湘（1895-1977）和蔡伯汾（1895-1984）分別因娶妻糾紛、創業問題而導致父子不睦，進而與黃旺成關係決裂。詳見李毓嵐，〈1920年代臺中士紳蔡蓮舫的家庭生活〉，頁74-76。

陳灶生（1892-1923）也染病過世，7月間，其父開設的商店陵豐號因乏人經營而廢業。⁶⁷至此，黃旺成一家上下的生計重擔全落在他肩頭上，這正是為何自蔡家請辭後雖恢復自由身，他卻無法慨然加入文化協會活動的最大原因，比起內心的理想，現實的家庭生計更是當務之急。1925年元月，友人張傑、曾瑞堯便已互相商議若黃旺成欲辭職回新竹，可一同合營事業的話題，黃旺成回竹後，就和諸友人合力推動紡織事業，6月間，黃旺成和曾瑞堯（1887-?）、張傑（1888-?）、張式穀、鄭元璧、張傳（1890-?）、李良弼、劉春木（1902-?）共八人為股東，合計出資8,000円，以黃旺成為「業務擔當人」，正式成立一間名為「友聯」的機織工場（諸位好友聯合出資之意），並聘請一位來自八重山的講師坡名城孫伴負責女工的講習與訓練。⁶⁸朝向他所言「脫離依賴生活、發揮獨立自尊」的生活邁開了第一步。

回到新竹後，黃旺成之所以未即刻加入文化協會的行列，除了經濟重擔因素外，還有他對新竹文化環境的看法。1925年3月底友人鄭作衡（1905-1979）與張榜（1897-?）拜訪黃旺成時，談到了文化宣傳事業，「予將比利時之局外中立來比照新竹之現狀，道破作事必要支配現勢，不可被現勢支配」，意即他認為新竹的文化環境若要有所發展，則須既不為官方所支配，也應保持與受官方顧忌的文化協會之距離，而尋求自主發展空間。當日會談後，張榜即力勸黃旺成研究「竹聲會」的改造工作。⁶⁹該會是黃旺成尚寓居臺中的1921年2月間，由新竹有志青年所創，有些成員還是其好友，如會長張式穀。然而這是一官方主導性甚為強烈的青年團體，剛成立時被定位為設置「國語普及會」，開設以國民性涵養以及自治精神養成為目的的通俗演講，並作為教育設施與風俗改良上的輔助機關。⁷⁰可以想見黃旺成對於如此內涵的組織是不會滿意的，因此他曾在休假回竹期間與友人的談話裡，比較臺中紳士〔按：議會設置請願的主力多為中部仕紳〕和新竹

⁶⁷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年》，頁130、268-269、280-282、346；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年》，頁206、248。

⁶⁸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34、142、163、190-191、196-197。

⁶⁹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102。

⁷⁰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年》，頁82。竹聲會於1921年5月27日（海軍紀念日）在新竹第一公學校講堂舉行發會式，與會來賓包括新竹郡守宮本信義，顧問新竹街長渡邊發藏、視學三上敬太郎、第一公學校長安山圭三等人，都可看出官方主導之一面。參見〈竹聲會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5月27日，第3版。

紳士之性格，並諷刺後者嫉妒、無團結力；也曾寫作漫評〈敬告竹聲會諸君子書〉投稿給黃爾璇囑託於《臺灣新聞》刊登，當時引起新竹人士一陣議論。因此，早在辭職返鄉前，關於竹聲會所應肩負的使命與實行方法，早已成竹在胸。⁷¹

在黃旺成心目中，竹聲會是比文化協會新竹支部更適合提升新竹文化風氣的組織，1925年5月22日，經過一番思考與研究後，他與張榜、鄭作衡、張式毅、孫牽、洪石龍、李良弼等友人開會討論，「先談起吳廷輝一派之運動文協失於輕率事，然後討議竹聲會會則，把我的起草增加了些，修飾至論調都徹底」。兩日後，竹聲會會則變更的商議正式結束，黃旺成還特意向吳廷輝說明該會改革一事，並勸吳氏切莫性急設置文協支部。5月底，黃旺成等人將修改過後的竹聲會會則帶至街役場，由黃氏負責向街長藏田壽吉報備、商談，獲得街長理解後，5月30日脫胎自竹聲會的「新竹青年會」正式成立，當日下午在新竹公會堂開議臨時總會，由黃旺成擔任新會則的說明工作，晚上便在原場地舉行通俗講演會，共吸引六、七百名聽眾參與。⁷² 往後，新竹青年會在新竹各地舉辦通俗講演，1925年6-10月，為其活動高峰期，一連舉辦了近十場「通俗講演」，正好與文化協會在新竹的活動互為表裡。其中又以8月17-20日一連四晚，在西門內媽祖宮、東門關帝廟、南門第一公學校、北門鄭氏家廟，宣揚打破舊曆七月普渡陋習、「期以救援沉溺在迷信深淵中之新竹社會狀態」之演講最具代表性⁷³（詳見表一）。

在籌備新竹青年會和友聯機織工場的過程中，黃旺成也和較親近的友人籌組一名為「修養會」的讀書會，針對當時各項的社會問題和思想議題進行討議。該會同樣也是他在臺中蔡家時，就已和友人互有共鳴、起心動念的構想，但具體付諸行動均待返回新竹後。1925年黃旺成辭職前後，有關孫文過世的消息與耳語即不斷流傳，甚至1月底、2月初都有虛構的報導登載相關消息，直到3月13日才確實傳來其死訊。⁷⁴ 4月3日上午，黃旺成以自家書齋為會場，與張傑、張式毅、張傳、張榜、曾瑞堯、鄭作衡、蘇福（1897-?）、劉春木、戴良、周燦共計十一

⁷¹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年》，頁77、120、126、136。

⁷²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106、109、164、166-172。

⁷³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242、246-247、250、254-258。

⁷⁴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38-39、48、88-89。黃旺成頗為熱衷孫文之思想，因此對其過世震驚不小，如1月29日的死訊雖為虛報，但黃旺成當天的日記記錄道：「下午冒雨 木屐、雨衣往成記閱報紙 知道中國偉人大革命家孫逸仙先生於去廿六日以癰腫切開腹部 經過不良逝去 享年五十九齡 嗚呼 先生乃革命之最大元勳 亦世界之大傑也」。

人，開了一場「中山先生追悼會」，並由黃氏親作弔詞。下午則開始第一次的修養會讀書會，由黃旺成進行一場「自信是有血有淚的」講演後，與諸同仁商定每月農曆十六日召開一次，輪值則以年齡為序；⁷⁵ 日後該會討論的議題相當廣泛，如自由平等、文化、自治、戀愛、非孝論、新思潮、民眾政治、性的善惡、宗教等，都在鑽研之列（詳見表二）。

（三）加入臺灣文化協會

自從 1925 年 6 月在新竹舉辦第一場文化講演後，臺灣文化協會便積極在當地從事組織和文化啟蒙的工作，如暑假期間，邀請東京留學生團進行講演會等。黃旺成雖然將重心放在新竹青年會的活動上，但他也曾告訴吳廷輝「以後文協之在新竹要如何活動的事，予雖不能與之同事，然可提攜者不辭勞，以為吾竹盡點義務也」，⁷⁶ 可見並非完全不與文化協會往來。10 月 9 日，文化協會新竹支部成立，並決議設立紀念文庫，當日林獻堂、葉榮鐘、莊垂勝（1897-1962）、蔡培火一行又特地前往參加創立儀式，有趣的是，並非文協成員的黃旺成不但全程與林獻堂同席，更在林氏勸誘下承諾於當晚的演講中登臺，講題為「活動」。⁷⁷ 因此機緣，文化協會再度邀請黃旺成加入擔任「文協本部講演團新竹駐在員」，並開出月薪 60 元的條件。11 月 4 日，蔡培火親自到新竹說服黃旺成加入文化協會，在新竹支部楊良、戴雙喜、林浴沂等人也同聲恭維下，黃旺成最終允諾加入。⁷⁸ 他決定加入文化協會的理由約有以下兩端，其一，黃旺成雖成立了友聯機織工場，但經營未上軌道，並無法消解家計負擔上的壓力。事實上，在文協勸誘加入的同時，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視學安山圭三也詢問黃旺成是否願赴新竹郡役所工作，幾經考慮後他決定就任公職，並遞交履歷書予新竹州郡守古木章光審核，惟之後並無明確下文，才轉而加入文協講演團。⁷⁹ 其二，新竹青年會在文化活動的成效

⁷⁵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年》，頁 348；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 43、84、86、114-115。

⁷⁶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 193。

⁷⁷ 其他講題為莊垂勝「反省」、邱德金「教育」、蔡培火「自由平等觀」。參見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 310-312。相關報導可見〈新竹聯合設立文協支部〉，《臺灣民報》77（1925 年 11 月 1 日），頁 6；該報導也詳列了新竹支部的幹部名單。

⁷⁸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 333-334、339-340。

⁷⁹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 314、321。很特殊的是，黃旺

上不如預期，該會成立的頭兩個月所舉辦之通俗講演聽眾都約有四、五百人之譜，一度讓黃旺成認為「將來新竹文化之向上可望也」，⁸⁰但9月份之後，聽眾銳減至僅有百餘人，甚至一、二十人，每每令黃旺成覺得「大殺風景」，⁸¹對比文協文化講演反應熱烈的場面相形失色。另外，新竹青年會也曾出版《青年會會報》來配合活動進行與宣揚理念，但由於讀者數少加以銷售成績不佳，未幾便出版告終。⁸²雖然黃旺成仍持續參與新竹青年會的運作與活動，但這樣的成績實為刺激他轉換跑道以期啟蒙更多民眾的催化劑。

加入文化協會不到一個星期，黃旺成就在新竹內媽祖宮開辦的文化講演中登場，題為「進步與保守」。日後他平均每個月都會開講2-3場，基本上以新竹和苗栗一帶為主要範圍，但也曾去過高雄、屏東、汐止、松山、宜蘭、羅東、三星、基隆、鹿港等地，例如1925年歲末年終，他和蔡培火、陳逢源一連五天在高屏巡迴，依序在旗津、鳳山、旗山、屏東、潮州等地進行講演，聽眾達千餘人至兩千人⁸³（詳見表三）。

展開四處巡迴講演的生活不久後，本為黃旺成生活重心的新竹青年會、修養會及友聯機織工場的事業，都一一遭逢變故與危機。首先，1926年4、5月間青年會內部為了設立「新竹街獎學金」是否接受當地富紳鄭肇基（1885-1937）、蔡煌等之贊助（黃旺成謂之「仰富人鼻息」）一事而有所爭議，不僅如此，具理想主義的黃旺成也希望改革新竹做醮迷信、鋪張浪費的舊俗，而與擔任做醮委員會的鄭肇基、蔡煌等有所衝突，甚至寫了一篇〈請看他們的高見〉投稿於《臺灣新聞》。新竹青年會內部在新竹街獎學金和做醮改良事的討論意見紛歧，黃旺成與

成加入文協本部講演團後，由於文化協會本部財務吃緊，因此預定要給黃旺成的六十月月給乃由新竹支部分擔一半，另一半由林獻堂、蔡式毅以及友人張傑支付，令他感嘆「噫！我的生存權固然這樣可憐嗎？」因而決定不支領薪俸。不料，卻有耳語傳出黃旺成之所以不願支薪乃是出於對文協的不滿，為此，他還特地作信兩封予林獻堂說明辭退月給的緣由。最後，在與林獻堂當面商議後，決定接受由本部撥付的部分薪資。參見黃旺成著、許雲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352、358-359、362、364-365、386、400。

⁸⁰ 黃旺成著、許雲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230。

⁸¹ 黃旺成著、許雲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296、328。

⁸² 《青年會會報》開始發行的時間不詳，目前僅見發行量的統計數字中，1927年只有1200份，1928年更驟減為200份，1929年發行量不詳。參見新竹州編，《新竹州第八統計書》（新竹：該州，1930），頁82；新竹州編，《新竹州第九統計書》（新竹：該州，1931），頁86；新竹州編，《新竹州第十統計書》（新竹：該州，1932），頁94；新竹州編，《新竹州第十一統計書》（新竹：該州，1933），頁94。

⁸³ 黃旺成著、許雲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397-412。

好友間意見也不一致，風聲走漏得很快，甚至有該會分裂的耳語傳出。⁸⁴ 此次風波後，青年會內部雖仍維持表面的和諧，但彼此間心結已種下，及至 1929 年 3 月，該會因幹部熱情消卻，會中體育部青年紛紛出走，另組依附於官方的「新竹青年團」，青年會仍逃不過解散的命運。⁸⁵

其次，黃旺成與友人組織的讀書研究會「修養會」，也自其加入文化協會後，從單純讀書、討論社會議題的場合，逐漸變成好友間社交懇親、吃喝閒聊的聚會，值東者在意宴會與菜色的張羅甚於對研討課題的準備，令黃旺成多次抱怨修養會「至此完全成了一個食會」、「怠氣滿」、「破天荒的浪費」，並且聲明退會，僅以「客員」資格列席旁聽來表達他的失望與憤怒，最終這個流於形式的讀書會於 1928 年 3 月劃下句點。⁸⁶

最後，是友聯機織工場經營的情況。友聯成立之初頗得官方援助，如新竹州勸業課長劉明朝不但承諾以千百餘元的年度補助金予機織事業，勸業課也將負擔一位男工的薪水，且成品扣除街、州留存部分外，其餘全以原料價賣給工場。1926 年元月，街役場同意將新竹慈惠院無償貸予友聯充作機織工場所在地；而後，也要求友聯提出年度計畫、收支預算書、會社章程與公開說明書等文件，敦促友聯從工場進一步改組成會社，以領取年度二千元的補助金云云。⁸⁷ 甚至經股東之一的鄭元璧調查臺灣織物的消費、生產統計後，得知本島自給之額尚未到十分之一，友聯機織業大有發展之餘地。⁸⁸ 就在一切看似有大好榮景時，同年 9 月開始

⁸⁴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一九二六年》（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14），頁 94、102、130、133、176-190。

⁸⁵ 〈新竹青年會解散〉，《臺灣民報》254（1929 年 3 月 31 日），頁 2。根據陳文松的研究，自後藤文夫接任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的大正末期開始，開始出現青年「會」移轉為青年「團」的變遷過程，顯示殖民政府對於官制青年團的態度，從消極放任對青年教化積極強化的轉變。其中，於 1926 年新成立的文教局，更是青年教化政策的總司令部。原先由新竹青年主導文化革新運動的新竹青年會，於此時轉變為由官方強勢主導的新竹青年團，亦符應此青年政策脈絡的走向。詳見陳文松，《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頁 199-215。

⁸⁶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 338；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一九二六年》，頁 172、295-296、393；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五）一九二八年》（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15），頁 94。

⁸⁷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 220、223、227、236、241、337、373；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一九二六年》，頁 14、25-26、46、55、94、104、186-187、200-202、206、208-209。

⁸⁸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一九二六年》，頁 215。

卻陸續收到勸業課機織相關的主事小池金之助傳來補助金無望的消息，接著連男工的薪資補助也收回，且作為工場用地的慈惠院使用期限只到隔年3月，之後便要轉借予由官方倡組、鄭肇基主導的臺灣蓮草株式會社，如此無異於宣判友聯的末日。1926年11月，幾位股東開始商議機織工場的善後方式，由於已經失去繼續經營的動力，工場的織工更顯得怠氣滿滿，最終於隔年3月底停工解散，並於12月召開友聯決算會，將八位股東的財務處理清楚。⁸⁹

（四）就職臺灣民報社與文化協會分裂

就在黃旺成考慮友聯善後事宜的前後，臺灣民報社除了位於臺北下奎府町的臺灣支局外，也決定在新竹開設通信部，並欲聘請其為主任。1926年9月下旬，該社的謝春木（1902-1969）到新竹與黃旺成交涉加入報社之事，告知曰「暫時約一個餘月往臺北支局勤務，為囑託記者。然後回竹為地方駐在記者，要於共進會時設通信部，為明年四月設出張所之先聲。而囑託記者月給四十五円，為記者時可六十円以上」。但當時黃旺成仍在為將友聯工場改設為織布會社而努力，因此未馬上應允。直到11月間確定友聯前途無望時，他才正式允諾入臺灣民報社擔任記者。12月2日，黃旺成前往臺北支局，由謝春木頒授辭令、正式就職。之後新竹共進會（1926年12月4-14日舉行）的閉幕式上，黃旺成僱請兒童散發臺灣民報社新竹通信部成立的宣傳單，且分贈兩、三千部免費的《臺灣民報》。⁹⁰ 1927年7月16日，該報自東京移轉回臺灣發行，並於9月廢止臺灣支局，另成立東京、臺中、臺南三處支局，此外，也敦請張我軍（1902-1955）擔任北京通信部主任。⁹¹ 隔年8月，蔡添丁辭去臺中支局主任一職，⁹² 在林呈祿、林煥清（1901-？）的請託下，黃旺成以新竹通信部主任兼臺中支局主任，同時負責兩地的報導事宜，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至1929年7月由李金鐘（1904-？）遞補臺中支局主任

⁸⁹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一九二六年》，頁316、360、365、378、384、303；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15），頁22-23、108、110、125-126、395-396。

⁹⁰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一九二六年》，頁258、309-311、336、345、385-386、392、407、409-410、426。

⁹¹ 〈臺灣民報社設三支局〉，《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9月16日，夕刊第4版；《臺灣民報》189（1928年1月11日），頁16；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頁245-246。

⁹² 〈蔡添丁氏〉，《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8月1日，夕刊第4版。

為止。⁹³ 黃旺成奔波往返新竹、臺中期間，林獻堂擔任董事長的株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也於同年1月13日成立，正式朝發行日刊的目標邁進。⁹⁴

黃旺成加入臺灣民報社擔任記者的時機點非常關鍵，此時距離日治時期臺灣政治社會運動的分水嶺——文化協會因內部左翼青年與穩健派的立場不一導致運動路線分裂——已不到一個月，而他正好親眼目睹整個過程。該會的分裂肇始於1926年7月底，理事會討論政治團體的兩件草案時，連溫卿（1895-1957）、王敏川一派已與蔣渭水一派相持不下，形成無產階級解放思想與民族自決解放思想的對立局面。同年10月17日，文化協會第六回總會在新竹召開，連溫卿一派主導通過文協改組決議案，積極搶奪該會領導權，並決定於隔年1月3日召開臨時總會。⁹⁵ 會後，林獻堂指派林幼春、黃旺成等八人擔任會則修改起草委員，1926年11月14日黃旺成先是與蔣渭水、鄭明祿（1902-?）、謝春木在臺北大安醫院討論起草案，11月20、21日，再至霧峰召開由林獻堂主持的起草委員會，會中蔡培火、連溫卿、蔣渭水三人分別提出文協改組的議案，據黃旺成在起草委員會上的觀察，「培火和渭水老實是水火之不相容」。⁹⁶ 簡言之，當時文化協會約略分為三派，蔡培火代表維持該會以往活動方針的一派，蔣渭水代表採取中國國民黨式全民運動一派，連溫卿則代表無產階級運動路線一派。⁹⁷

1927年1月2日臨時總會前，文化協會先在臺中市榮町東華名產株式會社召開理事會，會上先討論四十多位非會員的無產青年入會一事，最後接受其入會，根據黃旺成日記的描述，當日「無產青年大多數傍聽，中有一女子、洪石柱

⁹³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五）一九二八年》，頁196、202、217、242-244；〈餘錄〉，《臺灣民報》269（1929年7月14日），頁9。

⁹⁴ 黃旺成，〈黃旺成日記〉（未刊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1929年1月1日、1月6日、1月12-13日、1月24日。

⁹⁵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頁108-109；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一九二六年》，頁356-358。日記中僅言及黃旺成在第六回總會上擔任記錄組的工作，以及總會隔日（10月18日）蔡培火、陳逢源、謝春木前往文協新竹支部赴連溫卿的「政治結社打合會」，但並未提及大會討論及打合會的內容。

⁹⁶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一九二六年》，頁389、392、394-396。

⁹⁷ 許世楷著，李明峻、賴郁君譯，《日本統治下的臺灣》，頁370-371。蔡培火、蔣渭水、連溫卿三人，也分別在1927年的《臺灣民報》新年號上，刊登他們對自己的路線與理念的說明，參見蔡培火，〈我在文化運動所定的目標〉、蔣渭水，〈今年之口號「同胞須團結 團結真有力」〉、連溫卿，〈過去臺灣之社會運動〉，《臺灣民報》138（1927年1月2日），頁8-11、11-12、12-13。

(1901-?)、(王)敏川、(連)溫卿、(蔣)渭水都用爭議的態度反對予的發言權(是起草委員不是理事)。連卿案占優，穩健派都想脫離，老實遺憾的很」。1月3日，文協移師鹿港公會堂召開臨時總會，會中蔡培火案與蔣渭水案先後被否決，由連溫卿案取得優勢不說，連派更和無產青年使用各種手段干擾其他會員發言，黃旺成錄曰「全會場的議論完全受連溫卿一派的無產青年支配、十分喧嘩，不給連派以外的人們議論，以壓倒的聲勢要通過他們的主張，不平者漸漸棄權、退場」。至此，文化協會完全分裂，由連派主導並轉為左翼團體。⁹⁸

(五) 臺灣民眾黨與「臺灣思想界分野」

退出文化協會的舊幹部，決議組織政治團體支援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在歷經「臺改革新會」、「臺灣民黨」的改組及嘗試後，最終於1927年7月10日在臺中聚英樓舉行「臺灣民眾黨」發會式，黃旺成與謝春木、黃周(1899-1957)、彭華英(1895-1968)、陳逢源被推選為創立委員。⁹⁹8月中旬，黃旺成再向新竹郡役所警察課長瀨上光次提交臺灣民眾黨新竹支部的申請書，8月28日該支部也在新竹公會堂順利舉行發會式，蔣渭水、彭華英特地與會，黃旺成再被推選為支部委員，晚間在同場地舉行政談講演，蔡培火、謝春木及蔡式毅為演講員，當中又以殿後的蔡培火演說最得在場千餘名聽眾之好評。¹⁰⁰爾後，黃旺成便以臺灣民報社新竹通信部和民眾黨新竹支部為重心，一面撰寫桃、竹、苗一帶各色見聞與報導發表於《臺灣民報》「地方通信」，一面從事民眾黨持續以議會請願運動為核心所舉行的各項活動。

「新文協」左傾後，主導幹部連溫卿等人繼續在各處活躍，積極主導勞工運動之進行，於1927年4月成立「臺灣機械公會」並發出宣言，支持高雄鐵工場

⁹⁸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頁6-16。關於文協分裂與左傾的詳細討論，可參見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頁108-109；許世楷著，李明峻、賴郁君譯，《日本統治下的臺灣》，頁369-398；林柏維，《臺灣文化協會滄桑》，頁213-260；葉榮鐘，《葉榮鐘全集1：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頁382-404。

⁹⁹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頁182、190-194、199-200、214-216、219-223、238-240。臺改革新會與臺灣民黨之所以未能成立，乃執政當局認為其組織綱領中帶有民族主義色彩，因此在申請成立臺灣民眾黨時，黃旺成在6月17日的日記中指出「當局要求蔣(渭水)不加入或宣言非奉民族主義」，歷經討論後，「予主張蔣(渭水)加入、宣言非民族主義得過半數的贊同通過舉實行委員五名(謝)春木、黃周、(彭)華英、(陳)逢源、(黃)旺成」。

¹⁰⁰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頁251、278、291、295。

的罷工行動，號召各文協支部進行同情講演，但各地均遭到強烈取締而解散，並陸續傳出被警方檢舉者，直令黃旺成感嘆「殆有臺灣思想界分野之感」。¹⁰¹之所以有這樣的感慨，除了文協因左傾而分裂，致使總督府對政治運動加強取締動作外，也與新文協對舊文協幹部的各項指控和敵意有關。新竹州特務岡部義高曾向黃旺成表示，新文協的學金木投訴「舊文協志在民族自決，比新文協之階級鬥爭更為危險」，黃因而向岡部釋明「舊文協之民族運動是內臺人實際的親善，終局是在自治，沒有絲毫自決的意思」。1927年8月25日，新文協在新竹公會堂舉辦「第二回全島雄辯大會」，會上成員「齊口痛罵右派，主張打倒資本階級」。同年10月間，新文協新竹支部的負責人林冬桂（1893-？）更在臺中大會上指控黃旺成於經營友聯機織工場期間，曾收受街役場1,000元的買收，氣得黃直在《臺灣民報》刊登投書來反擊，並說明友聯歇業後，所有的機臺乃以1,300元賣給新竹州勸業課，以作為家庭副業講習之用，而他不過是八位股東之一，何來私相授受之處。新、舊文協在左、右立場上的對立及衝突如此鮮明，無怪乎某次黃旺成結束臺灣民報社本部編輯工作後搭火車回新竹，坐在對面者恰是要到新竹參加新文協講演的連溫卿，結果一路上兩人相視而坐，既未打招呼，亦無半句交談。¹⁰²

四、閒日月：進行政治社會運動的思想資源

上述兩節乃身為臺灣本地知識分子的黃旺成，是在何等的人生際遇與個人選擇下，由政治社會運動的旁觀者，成為涉身其中的實際參與者。然而除了私人因素與生命轉折外，實則尚須將社會條件與文化因素納入其中，方能從更深刻地脈絡掌握其由政治圈外進入圈內的背景因素。在此將由黃旺成得以從事政治社會運動的思想資源著手，並將焦點放在其書寫與閱讀上。

¹⁰¹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頁151-154。關於臺灣機械公會與高雄鐵工場罷工經過的相關報導，可參見〈高雄鐵工罷工的情況〉，《臺灣民報》155（1927年5月1日），頁4-6；〈臺灣鐵公所的勞資爭議〉，《臺灣民報》156（1927年5月8日），頁1；〈警察消滅工友會〉，《臺灣民報》157（1927年5月15日），頁8。

¹⁰²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頁154、204、276、292-293、346-348；〈專門捏造謠言的社會運動家 左派的戰術果如此嗎？〉，《臺灣民報》179（1927年10月23日），頁4。

（一）中國事物的關注與白話文的書寫

黃旺成在蔡蓮舫家任職的最後半年裡，蔡氏聘請了年方 21 歲的南京六合人士錢澤身，於家中教授其子蔡伯淙和其妾廖貴（1893-1947）官話（北京話）並介紹中國時況，¹⁰³ 黃旺成與錢澤身一見如故，彼此間的認識與共事成為他在蔡家任職尾聲最重要的一段經歷。

在接受近代教育前，黃旺成曾師從新竹赤土崎的張鵬飛和北門的周國珍學習漢學達 8 年之久，入新竹公學校就讀後，又受教授高年級生漢文的張麟書之薰陶猶多，這樣的學習歷程為他奠下良好的漢文基礎。任教公學校期間，又因內地人與本島人教員之間的緊張關係，因而其交友圈以新竹地區的本島人公學校教師為主，並逐漸發展成以吟詩作對活動為主的社群，¹⁰⁴ 因此他對於漢學與中國文化原就保有興趣，1919 年 3 月，辭去教職後所經營的「良成商會」又吹熄燈號，他得空到福州遊歷一個月，此乃其生平首度踏上中國的土地，回臺後仍不時憶起這段往事，而捧讀當時的日記再三回味。¹⁰⁵

任職臺中蔡家期間，由於蔡蓮舫本為前清秀才，其小妾廖貴也時常閱讀各類中國教科書，¹⁰⁶ 對中國各項事務抱有濃厚興趣，兩人常與黃旺成討論相關話題。舉例而言，蔡蓮舫不僅曾考慮過購讀《申報》，¹⁰⁷ 對於報刊上所載中國時事與話題亦甚為關心。1922 年 8 月 30 日至 10 月 29 日間，巒州牛在《臺南新報》第 1 版上連載〈大陸遊記〉計 59 回，黃旺成閱讀後對於內容所指稱的十名勝與各重要地方大有會心之處，因此自行製作一張中國地圖，並委託同事紀居才抄寫遊記中各重鎮及交通線的譯名，使之一目了然而可作為研究中國地理之用。由於蔡蓮

¹⁰³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年》，頁 280。錢澤身於 1924 年 8 月 29 日抵達臺中蔡家，黃旺成透過筆談得知錢氏祖籍杭州，乃錢塘射潮英雄錢王之後裔，因太平天國起事而避居南京、再移六合。

¹⁰⁴ 王世慶訪問，〈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頁 79-80；張德南，〈堅勁耿介的社會運動家：黃旺成〉，頁 29-30、35-37；曾士榮，〈一九二〇年代臺灣國族意識的形成：以《陳旺成日記》為中心的討論（1912-1930）〉，頁 14-17。

¹⁰⁵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七）一九一九年》，頁 52-81；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年》，頁 171；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頁 212。

¹⁰⁶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年》，頁 354。

¹⁰⁷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年》，頁 18。

舫不懂日文，乃叮囑黃旺成將全部的〈大陸遊記〉譯為漢文以便閱讀，因此黃旺成將所有的遊記剪下、貼於一冊剪貼簿上再進行翻譯，雖頗費心力，但從中可神遊中國各地並趁機練習翻譯能力。黃旺成自 10 月 24 日著手進行，至 12 月 1 日全數完成，而蔡蓮舫在閱讀其譯文後，也一度燃起想要進行一趟中國大陸之旅的欲望。¹⁰⁸ 正由於蔡蓮舫夫婦對於中國抱有孺慕之情，甚至有將其子蔡伯淙送至中國接受教育的想法，才聘請黃旺成擔任家教教授傳統漢學與中國的小學教科書。¹⁰⁹ 1924 年蔡家聘請錢澤身擔任家教的原因，應同樣不脫上述緣由。

與錢澤身的交誼對黃旺成最深刻的影響有三，其一為中國官話的學習，其二為中國局勢的討論，其三為白話文的使用，略述如下。在認識錢澤身前，黃旺成就對中國官話抱持興趣，曾閱讀《官話會話》、《日清會話》自學一段期間，也曾和蔡蓮舫互相練習，並「覺得非大難事也」。¹¹⁰ 但直到認識錢氏後，在密集學習且有交談對象的條件下，黃旺成的官話會話能力才有長足的進步。他從旁聽錢澤身教導蔡伯淙官音字母（即注音符號）開始學起，並將所習得官話的聲母、韻母及單詞記錄在日記裡，再輔以臺灣話和日文五十音來標音學習。同時，黃旺成也到臺中瑞成書局購買《中國國語會話指南》來自修，在平時的相處中，他也盡量使用官話與錢氏交談。如此熱切練習的結果，讓黃旺成的學習進度超越蔡家所有成員，不出一個月已能以純官話和錢澤身對談，¹¹¹ 因此也常擔任日、中、臺三方人士間的翻譯，如 1924 年 10 月初任職報社的友人黃爾璇與錢澤身談論中國時事時，或同年底田川大吉郎、蔡培火與林攀龍至蔡蓮舫宅拜訪後，田川在臺中公會堂進行「融合協調」的演講，都有賴黃旺成居中口譯；再如商工銀行頭取木村匡於 1925 年 2 月抵臺巡視各支店情況，也曾造訪蔡家，「木村翁同澤身君日支親善起來，我就做了通譯」；而霧峰林澄堂和大屯郡守奧田達郎，一同面會臺中州知事本山文平拜託樟樹豫約賣渡之事，也是請託黃旺成通譯。¹¹² 不只如此，黃旺

¹⁰⁸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年》，頁 312、350、352、356-360、366、368、372、399、401。1923 年 1 月間，黃旺成又對譯稿進行校訂工作，參見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年》，頁 24。

¹⁰⁹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年》，頁 323、328、384。

¹¹⁰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年》，頁 164-165、280、288。

¹¹¹ 如在 9 月底一次宴會中，黃旺成「與錢君用北京語說笑 眾皆不懂」。參見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年》，頁 283-284、287、302、308、336。

¹¹²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年》，頁 317、404-405；黃旺成著、許雪

成也和錢澤身達成協議，平日上午 11 點至 12 點半間進行語言交換教授，錢氏教導黃旺成官話，黃則授以日文。除了官話之外，黃旺成也曾向錢氏學習英語（教材為 *New School Reader*，黃因不諳英語而用片假名誤記為《ニュー スクール グリーダ》）和演說口調，對語言展現出旺盛的學習態度。¹¹³

錢澤身的到來，也讓黃旺成有更具體討論中國事物的對象，此前雖然他也會與蔡蓮舫、廖貴及其他友人、訪客談起相關話題，也會透過閱讀書報來認識當代中國情勢（如前述〈大陸遊記〉的閱讀、製圖及翻譯），¹¹⁴ 但與來自中國的錢氏相較，仍不免有隔靴搔癢之感，更不用提錢氏能提供書報上所未載的情況。黃、錢二人談論的話題相當多元，包括錢氏的家世背景、上海黑幕、中國思想文化、工商業發展、地方軼聞、政聞、康梁事蹟與言論、中國學校教育等。其中，梁啟超在南京演講時曾云「臺灣人如妓女受政府強度壓迫大，不平時政府就少施恩惠即忘前怨，將來必至無飯可吃之地步」，並以「黃帝之子孫，何竟不幸若是者也」一語為臺人慨嘆，令黃旺成印象極為深刻。然而縱使彼此間相談甚歡，仍偶有意見不合之時，例如錢澤身極力主張中國文化而排斥共產主義，認為昔日中國曾實行類似共產的制度都未能成功，現在豈可倒行逆施云云，就被黃旺成評為是「守舊派」的思想；再如談論平等自由時，錢氏認為天下絕無平等之事，因此階級劃分實屬必要，若同當差者同食，必定會助長不遜之心。這樣的論調不禁讓黃旺成感嘆「唉！澤身你也是個年少聰明的人，怎末這樣拘守？我實在沒有法子可以破你的頑固了」。¹¹⁵ 從此般談話內容可明顯觀察出錢澤身堅決反對共產制度，但對

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 57-60。黃旺成自蔡家去職回新竹後，1925 年 7 月下旬錢澤身曾造訪新竹，並與黃旺成的友人張式毅、張傑、張榜、張傳、曾瑞堯、李良弼、劉春木、鄭作衡、鄭元璧等人討論中國五卅慘案的顛末時，也是由黃旺成居間翻譯。參見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 231-232。

¹¹³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年》，頁 304-305、355。必須說明的是，黃旺成的官話會話雖已上手，但因學習時日尚淺，仍然無法流利地對談，因此當他看到錢澤身與臺中林瑞騰、王雨生、林正熊等人用流暢的中國話談論時，仍覺得慚愧不已。參見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 66。

¹¹⁴ 例如除了報刊的報導外，黃旺成曾閱讀《支那外交史》瞭解晚清自鴉片戰爭以迄義和團事件間，清帝國於外交上積弱之由來，辛亥革命後唐紹儀、陸徵祥、趙秉鈞的組閣過程，以及宋教仁暗殺、四國借款、二次革命與袁世凱政府間的關係；也曾購讀《吳佩孚史》瞭解當時中國軍閥割據和政治情勢。詳見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年》，頁 380、382-384；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年》，頁 380、383-385。

¹¹⁵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年》，頁 292、302、316、324、354、358-361、379、381-382；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 72。

於身處各色社會主義思潮正不斷湧入臺灣社會及知識界的黃旺成而言，卻無法贊同如此言論而譏之為保守。但無論如何，錢氏已開啟了黃旺成窺探近代中國時局的另一扇窗。

自1925年2月10日起，黃旺成書寫日記的風格逐步有所轉變，從先前文、白夾雜的書寫風格改易為以白話文體為主，因而在篇幅上的擴增十分明顯。此一轉變未必全然受錢澤身影響，卻有一定程度的關連。1924年5月黃旺成返回新竹期間，曾拜訪漢文老師張麟書與摯友張式穀，就曾談論「中國白話文流行之可否」的問題，對此議題黃旺成認為「先生過於拘執，而式穀似有過於跑風氣之嫌」，¹¹⁶但可見他並不反對中國這股源於五四的新文學運動之風潮。在黃旺成的新竹友人中，以鄭作衡對白話文學最為熱衷，1925年春節假期，鄭氏便曾拜訪黃旺成探討新文學的價值，並出借陳獨秀與胡適的作品，以及一些白話文小說（如王統照的《一葉》）、雜誌，讓黃帶回臺中閱讀解悶，黃旺成正是在2月10日返回臺中後開始用白話文體撰寫日記。¹¹⁷錢澤身來到蔡蓮舫家以後，黃旺成也與他談論過中國文學與新文學運動的話題，如1925年2月中旬返回臺中後，「和澤身談起新、舊文學的好處及『孝』字之解說，大家各有見解，滔滔地論的面紅耳熱」。¹¹⁸這次的臺中行是黃旺成任職蔡家的最後一段時光，將辭之前，錢澤身致贈對中國文學有濃厚興趣的他《古文詞類纂評註》兩函，及《中國文學參考書》、《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字源流》各一冊。¹¹⁹此後，黃旺成辭去蔡蓮舫家的職務回到新竹，仍與錢氏互通白話文書信維持友誼、討議中國時局。¹²⁰

透過書信往返、閱讀白話文讀物，以及持之以恆的日記書寫，黃旺成很快就培養出白話文的書寫能力，基於語言環境之故，他所書寫的白話文並非中國白話文，而是一種在殖民地社會條件下受殖民統治者、被統治者本身與「祖國」（中

¹¹⁶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年》，頁162。

¹¹⁷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51-53、66。

¹¹⁸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63。

¹¹⁹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74。

¹²⁰ 如1925年4月15日錢澤身來信告知蘇州、杭州開設春米廠，且取得不錯成績的狀況。參見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62、128、298-299。擅長漢文古詩的黃旺成，也開始在日常生活中練習創作白話詩，1925年4月下旬便有感而發創作一首〈送春〉。參見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134。

國)要素的影響下,混雜著臺灣話(母語)、日文(國語)及漢文而「混成語化」的「殖民地漢文」文體。¹²¹然而他混雜式的文體,竟與《臺灣民報》為了要適合臺灣人讀者的讀寫能力所採取之書寫風格不謀而合。實際上,該報的創刊乃是為了解決《臺灣》和、漢文章兼寫以致篇幅有限的問題而來,亦即將《臺灣》「漢文部」的文章獨立出來,自成一部以平易漢文、通俗白話為主要文體的《臺灣民報》,其背後實隱含著尋求與中國連帶關係,並求得與總督府推行「內地延長」相對抗的戰略位置。¹²²當文化協會透過黃旺成斡旋而將影響力擴及新竹後,臺灣民報社也緊跟著在新竹州內成立通信部報導地方輿情,以作為移臺發行、甚至發行日刊的基礎,既是文化協會成員又是新竹在地人,並通曉《臺灣民報》寫作文體的黃旺成,自然被視為主掌新竹通信部的不二人選。

1927年7月《臺灣民報》移臺發行後,由黃旺成續任新竹通信部主任,1930年2月,新竹通信部升格為新竹支局,黃旺成亦升職為支局長。同年7月16日,已接手發行《臺灣新民報》的臺灣新民報社,特意於蓬萊閣舉辦自《臺灣青年》發刊以來的十週年紀念會,再於隔日召開編輯會議,決議將每期12頁的篇幅擴增為16頁,並在增加的頁面中開闢一頁專門報導「中國時事」,以解決過往僅片段而無持續追蹤中國時情的缺點,¹²³主其事者正是長期關注中國事物的黃旺成。事實上,為了能順利進行這項工作,他曾於當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間,至中國福州、上海、南京、青島、天津與北京等地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考察,返臺後

¹²¹ 舉例而言,黃旺成於1928年1月13日的日記內容為:「近午平良教師自州廳回來 說織布要『仕上』與否尚在考慮中 並且閒談起來 領悉染織會社國府氏的墮落生活及其家庭的詳情 平良氏前奉職於大阪丸善工場 中有三人台女的職工十分上達 日給8.0Δ 午後寫了一篇『時事』的原稿 下午和老曾下棋六、七局 不分勝負 晚到青年會閱報 作衡家坐談 八時過回家 古雲梯妻出山 傑等辦棹」。其中「仕上」、「工場」、「上達」、「日給」、「午後」為日文,而「出山」、「辦棹」則為臺灣話。參見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五)一九二八年》,頁16。有關「混成語現象」和「殖民地漢文」的概念與意涵,主要由陳培豐所提出,詳見陳培豐,《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3),頁1-24。

¹²² 〈增刊『臺灣民報』豫告!!〉,《臺灣》4:3(1923年3月10日),無頁碼;李承機,〈殖民地臺灣媒體使用語言的重層構造:「民族主義」與「近代性」的分裂〉,收於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臺北:播種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218-226。李承機指出《臺灣民報》使用的「折衷的白話體」,其實就是臺灣語、「中國的普通話」,以及「日本的語彙」這三者的「chanpon」(混雜);另見陳培豐,《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頁99-107。

¹²³ 黃旺成,〈黃旺成日記〉(未刊稿),1930年7月16-17日;〈本報增加紙面 刷新內容的豫告〉,《臺灣新民報》323(1930年7月26日),頁3。

以筆名「菊仙」於《臺灣新民報》連載十五回的〈新中國一瞥的印象〉。¹²⁴ 而在此回中國遊歷中，黃旺成也順途訂閱了天津的《大公報》，自6月中旬起，便定期收到這份報導中國時局的刊物，並將重要內容定期摘錄於「中國時事」版面上呈現予讀者。¹²⁵ 要言之，黃旺成之所以加入臺灣民報社擔任記者，並能夠流暢地運用混雜式的白話文寫作為數不少的稿務，除了政治評論外，也能夠改寫中國出版的報紙與文章，將中國時事介紹給臺灣民眾，而在當時被視為中國事務的專家，¹²⁶ 與他在臺中蔡家任職的最後半年和錢澤身之間的相處不無關係，亦和民報社的自身定位和社務走向息息相關。

(二) 閱讀生活與讀書裝置

自從1910年代擔任新竹公學校教師開始，個人廣泛的閱讀和來自交友圈的

¹²⁴ 有關黃旺成此行與〈新中國一瞥的印象〉之分析，可參見陳翠蓮，〈想像與真實：臺灣人的祖國印象〉，收於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〇～一九五〇》（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179-222。而出發前幾日，黃旺成曾在前往臺中的火車上巧遇錢澤身，藉以得知旅行中國種種注意事項。參見黃旺成，〈黃旺成日記〉（未刊稿），1930年5月1日。

¹²⁵ 黃旺成，〈黃旺成日記〉（未刊稿），1930年6月11日。有關黃旺成加入臺灣民報社之後，究竟如何取材與撰寫報導，且如何擇取與轉化《大公報》的報導載入《臺灣新民報》中，限於篇幅且時段超出本文設定的1920年代，無法在此完整陳述，僅舉一例略為說明。1930年7月16日《臺灣新民報》發行「十週年紀念號」（第322號）時，該社也已配合當時臺灣的行政區劃，完成五州新聞據點的布建，即臺北本社（1927年7月移臺發行後升格自原臺灣支局，原東京本社改為東京支局）、新竹支局（1930年2月升格自新竹通信部）、臺中支局（1928年1月升格自臺中出張所）、臺南支局（1928年1月升格自臺南通信部）、高雄支局（1930年7月設立），且進一步在欄位安排上，除了報導各地民情的「地方通信」之外，獨立出更能反映各支局輿情的「島都瑣聞」、「竹塹旋風」、「中洲噴水」、「赤崁流彈」、「高雄潮聲」等五欄。黃旺成時任新竹支局主任，各期主要的負責內容除了引介自《大公報》的「中國時事」（約集中於各號頁7）外，也要負責撰寫「竹塹旋風」（另外每期「冷語」專欄也固定由其撰寫）。此外，各支局主任尚要輪替撰寫每期開卷的「社說」。因而碰上須撰寫社說的號次時，黃旺成經常採取的寫作策略是將最重要的中國時事直接放入社說（同時也是應付龐大稿務量的權宜之計），有關中原大戰與蔣介石下野相關事宜的〈中國的時局〉（第317號，1930年6月14日）、〈中國的三大問題〉（第325號，1930年8月9日）、〈東北軍入關與時局變換〉（第332號，1930年9月27日）、〈中國的政局將如何演進〉（第336號，1930年10月25日）等社說，均出自他的手筆。由此可見新民報社在尋求與中國之間的定位和時局演變上的態度，及黃旺成在該社中所扮演的角色。透過定期、定量的引介，不僅報刊上的中國報導量篇幅倍增，原本《臺灣青年》、《臺灣》與《臺灣民報》中，合計340篇的「卷頭辭」或「社說」，僅14篇與中國事物相關，然而《臺灣新民報》自1930年3月29日發刊，至1932年4月15日轉發行日刊為止，總計104篇「社說」中，以中國為主題者就多達15篇，且多由黃旺成所撰寫。參見黃旺成，〈黃旺成日記〉（未刊稿），1930年6月7日、6月13日、7月16-17日、8月2-3日、9月23日、10月20日。

¹²⁶ 曾士榮，〈一九二〇年代臺灣國族意識的形成：以《陳旺成日記》為中心的討論（1912-1930）〉，頁10、33-34。

訊息傳遞，就一直是黃旺成吸收新知與形塑自身思想觀念的方式。受過漢學教育且接受完整總督府國語學校訓練的他，不僅可以運用日文及漢文寫作日記，也可同時閱讀兩種語言的書籍，特別是承載諸多新知及訊息的日文著作和報刊，其內涵的重層結構不僅對他而言並不構成閱讀上的阻礙，更成為近窺當代局勢與盤整世界觀的一扇窗，¹²⁷ 因此他對於許多新的知識形式抱持著興趣，也不時感到振奮。可以說，一直以來閱讀都是黃旺成生活的重心，唯一不同的是在各個人生不同的階段上，閱讀品味方面的轉變。1911-1918年擔任教職期間，與課程教授相關的教學指引和參考書籍、中國古典文學與小說、詩文賞析與書法的相關著作、日常生活用書及報刊雜誌，是黃旺成最常閱讀的四種類型，其中尤以古典小說為最大宗。¹²⁸ 1920-1925年在蔡蓮舫家擔任西席期間，其閱讀偏好仍以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為最主要對象，《史記》、《東周列國志》、《玉梨魂》、《花月痕》、《詞選》、《古今說海》、《三國演義》、《酬世錦囊》、《大宋宣和遺事》、《桃花扇》、《筆花醫鏡》、《牡丹亭》、《紅樓夢》、《疑雨集》、《再生緣》、《菜根譚》、《千家詩》、《閱微草堂筆記》等諸多中國古籍，是其在日常休閒與消磨時間的最佳選擇，特別是隻身在外、沒有家人的陪伴，當內心感到猶如天涯行客之孤寂時，閱讀往往是他選擇來消解寂寥與愁苦的途徑。¹²⁹ 而在錢澤身到蔡家任職前後，黃旺成也逐漸對中國的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產生興趣，並閱讀《求幸福齋隨筆》、《胡適文存》、《獨秀文存》、《一葉》等白話文著作。¹³⁰

另外，透過報刊來瞭解島內外情勢、社會百態，也一直是黃旺成不斷盤整其思想觀念的媒介之一。蔡蓮舫家訂有多份新聞報刊，因此黃旺成也維持著每日讀報的習慣，除了必備的日治三大報《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聞》與《臺南新報》之外，由於蔡家孺慕中國文化之故，曾嘗試購讀來自中國的報刊雜誌。更重要的是，因民族立場訂閱應議會設置請願而發行的《臺灣青年》、《臺灣》及《臺灣民

¹²⁷ 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2004），頁159-164。

¹²⁸ 莊勝全，〈腹有詩書氣自華？：黃旺成公學校教師時期的閱讀生活〉，頁276-282。

¹²⁹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如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年》，頁24、118、186、302、323、421；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年》，頁166；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6。

¹³⁰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四年》，頁347-348；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52-53、66。

報》一系列相承刊物，更讓黃旺成在官方立場的報導之外，有了認識時局走向的另一項選擇。透過定期閱讀，他盛讚此類由臺灣有志者與知識分子所籌辦的刊物「知其鼓勵青年之意志、輸入思想之新潮而裨益於吾輩，其功非淺少也」。¹³¹ 如1923年5月1日閱畢剛寄達的《臺灣》雜誌後，指出「滿冊慷慨可誦，中有黃朝琴駁《臺灣日日新報》對於臺灣議會請願記事之誤，一一指證。始知予等多受御用新聞之蒙蔽，深愧識見淺狹，而服留學生諸君之勞力」。¹³² 正是任職蔡家期間，黃旺成開始受到臺灣留學生及知識青年所引進的新知識、新思想之啟蒙，不只是他，新竹的一眾好友李良弼、劉春木、張式穀、張傑、蘇福、曾瑞堯、胡桂林等，均有購讀《臺灣》的習慣。¹³³ 因此即使分隔兩地，每逢相聚時仍能無縫地針對議會請願、公益會、無力者大會、治警事件等議題相互討論、各抒己見。

事實上，1920年代臺灣整體的智識環境有極大的變化與進展，而黃旺成的閱讀行為可視為其發展軌跡具體而微的縮影。首先，隨著鐵道網絡布建之完成帶動印刷媒介全國流通網之成形，促使日本國內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報刊及出版業得以快速流通、發展，不只影響民眾的閱讀行為與習慣，也出現了「讀書國民」，並在大正、昭和年間發展而成大眾讀者層，具體反映於報刊雜誌的購讀行為上。¹³⁴ 1920年代的臺灣雖然「讀者大眾」(reading public)尚未發展成熟，卻也跟隨日本的腳步進入了媒體報刊業的開展期，臺灣人自辦的《臺灣青年》、《臺灣》及《臺灣民報》系列刊物的出現，讓身為被殖民者的臺人從單純的情報接受方與消費者，搖身一變而成構築自身媒體和輿論的主體。¹³⁵ 前述黃旺成閱讀《臺灣民報》系列刊物所獲得的啟發，到日後加入臺灣民報社擔任記者撰稿的經過，正與這道智識脈絡的發展相呼應。

¹³¹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年》，頁274。

¹³² 黃朝琴，〈言論の責任を重ぜよ 臺灣日々新報の嘘に驚く〉，《臺灣》4:4(1923年4月10日)，頁43-50；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年》，頁171-173。有關1920-1925年間黃旺成的閱讀資料概觀，參見曾士榮，〈一九二〇年代臺灣國族意識的形成：以《陳旺成日記》為中心的討論（1912-1930）〉，頁48-52。

¹³³ 〈臺灣雜誌社收款登記〉，「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編號：053，頁46-48。

¹³⁴ 永嶺重敏，《雜誌と読者の近代》（東京：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1997）；永嶺重敏，《〈読書国民〉の誕生：明治30年代の活字メディアと読書文化》（東京：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2004）。

¹³⁵ 李承機，《台湾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頁117-179。其中，他認為臺灣的「讀者大眾」須待1932年《臺灣新民報》發行日刊與夕刊後，方才逐步成形。

其次，隨著印刷出版業的發達，圖書館作為印刷技術革新後典藏、流通數量繁增的書籍，及因應近代知識的邊界不斷擴增、分類與重整書籍秩序的空間，¹³⁶也在甲午戰爭後被日本視為文明的象徵，並開始以全國性的規模增設公共圖書館以取代此前傳遞訊息情報的新聞縱覽所（明治維新以降），成為培養「讀書國民」最主要的「讀書裝置」。¹³⁷臺灣雖然自日治初期開始就已出現私人設立的文庫、讀書俱樂部、閱報社等準圖書館性質的組織，但是1914年脫胎自臺灣文庫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才是第一所參考與通俗閱覽兼備的現代化圖書館（同時也是日治時期唯一的官立圖書館），且於1920年代各地才陸續增設公、私立圖書館。¹³⁸1923年4月6日，臺灣總督田健治郎以府令第43號公布〈公立、私立圖書館規則〉，其中第一條規定州、廳、市、街庄得以設置蒐集圖書以供民眾閱覽的圖書館，¹³⁹成為日治時期臺灣圖書館得以普遍設立的重要關鍵，如1921年全臺灣僅有3間圖書館（官立1間、私立2間），至1925年增為36間（官立1間、公立23間、私立12間）。¹⁴⁰

其中，新竹街為了紀念1923年4月間日本皇太子裕仁親王（即之後的昭和天皇）來臺進行的「東宮行啟」之旅，乃於該年8月間向當局申請籌設「新竹街圖書館」獲准，先暫時以新竹俱樂部圖書閱覽部加以修造，再展開為期三年的新館建造計畫。隔年自新竹州六十萬住民手中募得3萬5,278円，其中1萬円作為購書基金，剩餘金額全用作圖書館建築與添購其他設備之費用。新館自1924年12月開工，迄隔年7月31日完工，再於8月31日開館，同時升格為「新竹州立新竹圖書館」。¹⁴¹黃旺成回到新竹後，便時常進出新竹街圖書館和升格後的州立新竹圖書館，閱讀館藏的日文、漢文書籍，與各式各樣的報紙和日文雜誌，成為

¹³⁶ 彼得·柏克（Peter Burke）著、賈士蘅譯，《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169-192。

¹³⁷ 永嶺重敏，《〈讀書國民〉の誕生：明治30年代の活字メディアと読書文化》，頁198-214。

¹³⁸ 張園東，《走進日治臺灣時代：總督府圖書館》（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

¹³⁹ 〈公立、私立圖書館規則〉，《府報》2912（1923年4月6日），頁22。

¹⁴⁰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編，《臺灣總督府第二十九統計書（1925）》（臺北：該課，1927），頁110-111。但一開始使用圖書館的讀者仍不太多，除了官立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平均每日閱覽人數破百外（由392.6人升為441.2人），各公立與私立的圖書館平均閱覽人數僅在20人上下。

¹⁴¹ 〈行啓記念 新竹圖書館 十日附認可〉，《臺灣日日新報》（以下省略），1923年8月13日，第2版；〈紀念圖書館認可〉，1923年8月15日，第5版；〈新竹圖書館〉，1923年8月22日，第2版；〈新竹圖書館〉，1923年8月23日，第6版；新竹州役所編，《新竹州要覽：昭和八年》（新竹：該所，1933），頁67-69；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269。

他獲取新知的重要管道，如他曾在館內閱讀到《經世新報》對文化協會攻擊「說是帶著赤色煽動勞資爭議，我說這是向正義而行的，什麼赤不赤呢？」；也曾在《改造》中得蘇俄十月革命成功之緣由，以及主張「勞農同盟」的列寧主義和標榜「恆常（不斷）革命論」的拖洛斯基主義之意涵；或從《大阪朝日新聞》得知臺灣國富的實況，相較於日本內地的經濟情況要落後不少。¹⁴² 若有機會到臺北時，黃旺成也會撥時間造訪總督府圖書館瀏覽書報。¹⁴³

在此般智識環境的發展下，黃旺成在 1925 年回到新竹後逐步加入政治社會運動行列，這段期間在閱讀類型的選擇上出現極大的轉變。在此時期，除了仍然維持固定的閱報習慣外，中國古典小說、白話文小說和日文小說等休閒書籍的閱讀不再是首選，取而代之的約為以下四類讀物：其一，日文出版的社會主義作品，如大杉榮《獄中日記》（1919）、堺利彥翻譯郭泰（Hermann Gorter）《唯物史觀解說》（1920）、和田哲二翻譯列寧著作《左翼小兒病》（1926）、馬克思的《資本論》（1927）、河上肇的《第二貧乏物語》（1930）等。其二，日文出版的自由主義書籍，如森口繁治《立憲主義と議會政治》（1924）、田川大吉郎《普選の話》（1925）、矢內原忠雄《植民政策の新基調》（1927）等。其三，近代西方文史哲領域的作品，如鹿子木員信及饒平名智太郎合著《ガンヂと真理の把持》（1922）、桑木嚴翼的《現代思潮十講》（1925）、木村毅及相田隆太郎合著《世界宗教十六講》（1926）、沢田謙《ムッソリニ伝》（1927）等。其四，中國國民黨相關的人物與思想，如甘乃光《國民黨幾個根本問題》（1926）、上海三民公司編《孫中山軼事集》（1926）、戴季陶《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1927）、秦瘦鷗編輯《蔣介石先生講演集》（1927）、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實業部編輯《中國國民黨講演集》（1927）、《孫文全集》等相關著作。¹⁴⁴ 而黃旺成也採取將這些著作精讀後摘要於小冊子（研究帳）或日記裡，以「自己想是最得法」的方法來吸收之，¹⁴⁵ 俾便作為日

¹⁴²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 87-88、108、130、134-136、204、222。

¹⁴³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 290；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頁 293。

¹⁴⁴ 曾士榮，〈一九二〇年代臺灣國族意識的形成：以《陳旺成日記》為中心的討論（1912-1930）〉，頁 56-63。

¹⁴⁵ 實際上，黃旺成這樣的讀書法已行之有年，如 1923 年間他就曾將英國小說《白髮鬼》，以及《西洋歷史》中〈西洋文明之起源〉的內容摘錄於日記上，參見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二三年》，頁 224、334-335；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 113、149、179。

後從事演講、撰寫報導、參與讀書會的題材與內容。

質言之，1925年以前，黃旺成的閱讀多帶有個人興趣與休閒消遣、破除寂寥的面向，然而此後則明顯具有從事實業，以及為政治社會運動做準備的實用目的。舉例而言，他曾為準備「自由平等」的修養會課題，連日研讀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並細讀〈荀子〉和〈古代哲學之終局〉，探索哲學論及西元前三世紀的思潮；或為了能更深入討論「性的善惡」課題，向友人借閱荀子的書籍來研究「性惡說」，並將要項抄錄於日記上；還有一次為了「宗教」議題，特地到新竹街上的榮文堂書局購買《世界宗教十六講》（東京新潮社，1926），正是「要準備研究會的調查」。¹⁴⁶ 在友聯機織工場創立前後、招募男女織工之際，黃旺成向友人張傑借閱生田長江和本間久雄合著《最新社會問題十二講》（新潮社，1921），指出「（佛蘭西）二月革命最有價值，實係勞働者對資本家的革命，帶有政治及社會革新兩大使命，都以自由平等為標語，總之是人類解放之歷史也。又有產業革命乃本於アダムスミス（Adam Smith，亞當·斯密）的資本自由主義，把ギルド（Guild，基爾特）就是同業組合組織，變為資本家的大工場組織（機器發明也是促成一大要素），因而生出勞働者的級階」；在圖書館中閱讀《臺南新報》時「見中央社會事業協會幹事剛幸助氏的講演題，是『排斥個人主義，覺悟社會意識以救墮落之現代社會』一節，說為社會而讀書、而經營等事，深得吾心」。¹⁴⁷

再如擔任《臺灣民報》記者後，黃旺成購讀了天津《大公報》及十數種上海報紙，以改寫其中的中國報導、介紹大陸時事；而在《臺灣民報》移轉回臺灣發行初期，由於社務繁忙，他曾被請託至臺灣民報社本部幫忙撰寫與編輯新聞，因而閱讀由東京大日本新聞學會編輯的《新聞學及文章講義》（1926）學習新聞編輯法、新聞營業法和新聞記事作法等。¹⁴⁸ 且為了能夠更迅速與深入掌握社會實況和時代脈動，也一改之前外出借閱報刊雜誌的習慣，除了社內固定會寄送每期的《臺灣民報》到宅外，黃旺成也陸續訂購《臺灣日日新報》、《新高新報》、《改造》、《海外》、《成功》等報刊，並選擇其中重要的內容在民報上翻譯予讀者知曉，

¹⁴⁶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176、179-181；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頁28-29、74、86、96。

¹⁴⁷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190、192-194、198-200、204-205。

¹⁴⁸ 王世慶訪問，〈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頁89；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頁286、304、327。

例如 1927 年朝鮮總督府以朝鮮共產黨違反治安維持法為由展開暴力鎮壓行動，對此律師布施辰治不僅為被捕的共產黨員辯護，也於是年 10 月 28 日於朝鮮總督府東京出張所內，向政務總監湯淺倉平抗議總督政治體制的問題，再將整個面談過程發表於《海外》，黃旺成閱後火速將其翻譯，連載於《臺灣民報》。¹⁴⁹

黃旺成的思想資源除了透過廣泛的閱讀培養以外，來自交友圈的訊息傳遞，是另一個可資獲取的管道。1910 年代公學校教師時期，他就已和學校裡的本島人同僚成立各種詩會、書法會及讀書會，與朋友、同事與師長間交換閱讀所得和時事訊息，並互相品評詩作和書法的高下，成為黃旺成維繫人際網絡的主要方式之一。¹⁵⁰ 這樣的交情不僅未因到臺中蔡家任職、分隔兩地而沖淡，黃旺成於 1925 年返抵新竹後，詩會、書法會及讀書會的同好反而也在其銳意經營的友聯機織工場、修養會及新竹青年會裡，擔任股東、值東者及重要幹部而更加鞏固。這些新竹在地的摯友與師長不僅是黃旺成交換資訊與情報的重要管道，也是處理日常生活和家庭瑣事的最佳幫手，同時更是他參與政治社會運動過程中最堅實的後盾。

1920 年代初期在臺中蔡家期間，與人之間的交誼和溝通同樣是黃旺成非常重要的資訊來源，除了平日裡與蔡蓮舫、廖貴夫婦評論時事、漢學及中國事物，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與六合人士錢澤身往來，大大地刺激了黃旺成的官話學習、中國時局認識與吸收白話新文學。在蔡家工作的另一個影響是，由於和林獻堂等政治社會運動者常相往來，使黃旺成的人際網絡從新竹在地性的交友圈擴展為全島性的交際圈，並一直維持至他加入運動陣營。¹⁵¹ 特別是加入文化協會講演團、臺灣民報社及民眾黨後，在巡迴全臺各地演講、撰稿期間，不但可與各地群眾、重要人士交流，更能與其他政治社會運動的知識菁英就各式思想議題深入討論。一如 1926 年 4 月下旬夥同蔡培火、謝春木到宜蘭、頭圍、蘇澳、三星、基隆進行文化講演時，旅途中曾聽蔡培火發表人生觀及宗教觀乃「說社會是倫理的組

¹⁴⁹ 黃旺成著、許雲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頁 227、244、300、318、421-422；黃旺成著、許雲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五）一九二八年》，頁 20、291；布施辰治，〈抗議總督政治的非違：與湯淺政務總監的會見記〉，《臺灣民報》191-193（1928 年 1 月 15 日、1 月 22 日、1 月 29 日），頁 7、8、8。

¹⁵⁰ 莊勝全，〈腹有詩書氣自華？：黃旺成公學校教師時期的閱讀生活〉，頁 291-295。

¹⁵¹ 相關討論可見曾士榮，〈一九二〇年代臺灣國族意識的形成：以《陳旺成日記》為中心的討論（1912-1930）〉，頁 41-45。唯他是用「以臺灣為規模且相互重疊的朋友圈」來指稱本文所謂的「全島性的交際圈」。

織，將來一定要人口制限，今人超越生將來要超越死。自發的爽快就死回神之處，他很希望實行」。¹⁵² 又如在承諾謝春木入臺灣民報社擔任記者時，亦從謝氏的言談中得知連溫卿、王敏川等人欲進行政治結社與改組文化協會、變更會則的始末，以及許乃昌和陳逢源之間就「中國改造論」展開筆戰的實況。¹⁵³ 此外，黃旺成也曾和「老不客氣、性情豪邁」的楊雲萍暢談文學；與臺灣民報社專務林呈祿談論文協分裂、思想左右、以德報怨的態度及臺灣議會請願運動的精神；於深夜和臺灣民報社記者郭發對談臺灣的思想及社會運動家的態度。¹⁵⁴ 正由於如此頻繁交流之故，政治社會運動者之間的書訊交流也是構成黃旺成閱讀取向的重要來源，例如他曾閱讀過的森口繁治《立憲主義と議會政治》，便是由葉榮鐘寄贈之。¹⁵⁵ 不僅如此，黃旺成也曾接觸過河上肇、本間久雄、清水安山有關經濟議題、社會問題、文化啟蒙運動的相關著作，都是陳逢源曾在《臺灣民報》力薦給讀者的讀物。¹⁵⁶

五、結論

本文旨在說明身為臺灣本地新知識分子的黃旺成是在何等機緣下，加入橫跨整個 1920 年代，起始於東京、再傳回臺灣、以留學生為主體的政治社會運動。亦即並未接受過留學教育的本島知識菁英，在面臨這波對臺灣政治、社會與文化狀況帶來劇烈衝擊的時代浪潮時，可能會採取什麼樣的立場來因應。或許每個人的生活情境、知識背景與思想觀念均不盡相同，然而若從個人因素、人生際遇及社會條件等各種情境的交錯下加以檢視，應當更能理解面臨重大歷史事件時，位於歷史現場的人物，會如何做出應對與選擇。本文就是從這三個面向來檢視，黃

¹⁵²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一九二六年》，頁 152。

¹⁵³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一九二六年》，頁 386。有關「中國改造論」的思想內涵與論辯經過，詳見吳叡人，〈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臺灣人民族國家論述，1919-1931〉，收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臺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 76-82。

¹⁵⁴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頁 54、308、370。

¹⁵⁵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一九二六年》，頁 166-168。

¹⁵⁶ 芳園（陳逢源），〈讀書的趣味：良書的介紹〉，《臺灣民報》74-75（1925年10月11日、10月18日），頁 13-14、12。

旺成如何步上其一生「最感到愉快、最有意義的時期」。

在個人因素方面，1910年代自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後，黃旺成返回母校新竹公學校擔任教職，八年的教師生涯中，他充分感受到日籍教師和臺人教師在薪資、職務及語言使用上的不平等關係，也使其交友圈只限縮於新竹地區的臺籍公學校教師，並逐漸發展成以吟詩作對活動為主的社群。如此不對等的待遇不僅是他辭去教職的原因，也在心中種下了應力爭日、臺人間平等的種子。因而1920年代初期擔任蔡蓮舫家西席與資產管理人期間，黃旺成不僅支持並關注爭取臺人自治、平等與權利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也透過蔡家的人際網絡結識了以林獻堂為首的政治社會運動要角。然而因資產管理上的問題與東家蔡蓮舫父子間產生嫌隙之故，不願再寄人籬下的黃旺成於1925年春天辭職返竹。在家中男性成員相繼辭世，必須一肩扛起持家的經濟重擔之餘，他又思忖「脫離依賴生活、發揮獨立自尊」的營生方式，遂於回竹三個月後，與好友共組友聯機織工場，卻因遲遲不得官方奧援和支持，最終不堪虧損，僅經營不到兩年就停工解散。正因如此，黃旺成回到新竹後前幾年的經濟狀況雖不至貧困，卻也稱不上寬裕，¹⁵⁷是以能提供一份固定薪資的文化協會本部講演團新竹駐在員和《臺灣民報》記者工作，最能達成其心目中的理想又能兼顧家庭收入的志業。

在人生際遇上，於蔡家任職的五年間，黃旺成除了與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人士多所接觸外，任事末期更結識了來自南京六合的青年錢澤身，雖然僅共事短短半年，但志趣相投的兩人時常切磋學問、共商時局，他從錢氏身上也習得說中國官話、理解中國時勢，產生對白話新文學的興趣，均成為他日後投身政治社會運動、撰寫各式報導和評介東亞時局的珍貴資產。自蔡家退職後，正逢臺灣文化協會亟欲將其影響力滲透至新竹，又當地有志青年也受到議會設置請願和文化運動風潮鼓舞，欲將文化協會的活動引入新竹並設置文協支部，黃旺成的回歸恰好成為一拍即合的契機。在他斡旋林獻堂與新竹青年兩端下，文化講演、文協支部、《臺灣民報》取次店陸續在新竹開辦，甚至連1926年文化協會第六回總會也移師當地舉行。然而黃旺成雖然在文化協會入竹一事上有功，卻沒有即刻加入該陣

¹⁵⁷ 此由1926年年終，黃旺成結算家庭一整年的收支情形時可見一斑：「共費八百五十元 而我的費用兩百餘 修理家屋百餘 計共在千貳百圓之譜 而總收入不上五百圓 侵用約七百元」。參見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一九二六年》，頁444。

營，而是以自身理想從事新竹文化事業方面的改造，一方面與好友組織讀書會「修養會」以探究各項社會問題，另一方面以其交友圈為基礎，將竹聲會改造為「新竹青年會」，以推行各式活動提升新竹的文化風氣。只是前者最終淪為吃喝聯誼的食會，後者內部也因對建醮改良的意見不一而爭吵不休，加上青年會所舉辦的「通俗講演」在民眾參與度和影響力方面，均遠不及文化協會的文化講演，才將黃旺成推向了文化協會的陣營。

在社會條件方面，當時臺灣整體智識環境的發展，也為黃旺成參與政治社會運動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首先，1920年代是臺灣媒介報刊業快速發展的時期，號稱「臺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的《臺灣民報》系列報刊，構築了臺人發聲與策動輿論的管道。黃旺成任職臺中期間，由於定期閱讀東家訂購的《臺灣青年》、《臺灣》及《臺灣民報》，受當中所引介的新知識、新思想之啟蒙，正是他日後加入文化協會、民眾黨與民報陣營，起而打破舊俗、對抗保守勢力、進行民眾啟蒙的導火線之一。其次，黃旺成自1925年起開始使用混雜著臺灣話、日語及漢文的白話文體進行寫作，恰好與《臺灣民報》為了在官方內地延長主義的政策下，尋求相對應的文化策略，並維繫與中國間的關係所採行的報導文體相近，也是他加入民報社的契機與條件之一；同時由於他長期以來對中國事物的興趣，也成為該報追求發行日刊的過程裡，擔綱持續關注、報導與轉介中國時事和消息的要角。最後，圖書館作為文明的象徵，同時也是典藏、流通知識的「讀書裝置」，在總督府頒行相關法令後，也於1920年代被大量設置，其中包括黃旺成回到新竹後勤加走訪的新竹街圖書館和升格後的新竹州立新竹圖書館。如此，他更得以打破知識的藩籬，多元而即時地閱讀館藏的日、漢文書籍，以及各式報紙和日文雜誌，成為獲取新知的重要管道。透過長年培養的閱讀習慣與讀書方法，黃旺成最終得以將其習得的新知識和各類思想，透過口頭傳播的演講和筆耕而成的報導，啟迪臺灣普羅大眾的心田。而其閱讀型態也從單純只是休閒消遣的目的，轉而深具為生活、為推行政治社會運動而閱讀的實用面向。

透過日記追尋黃旺成投身政治社會運動的腳步，我們也能從中深刻感受到當時臺灣社會的氛圍與時局的變遷。1920年代前半期，總督府針對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陣營祭出柔性分化（如八駿事件）和強力彈壓（如治警事件）的政治干預，臺灣社會因而分化成為「兩大思想之潮流」，即親日派的仕紳站在「內地延長」的

立場，明確反對主張臺人自治、維持臺灣特殊性的臺灣議會，並成立「公益會」、「有力者大會」以反制；以林獻堂為首的請願陣營也不甘示弱，號召「無力者大會」以宣洩臺灣民意。同時，由於總督府在統治上高舉「內地延長主義」，而在教育政策上將原本只單純規定臺灣人學制的「臺灣教育令」，修改成標榜「內臺共學」的「新臺灣教育令」。關注時代脈動也用心於子女教育上的黃旺成，於是極力爭取長子黃繼圖共學的資格，促成其從臺人子弟為主的新竹第一公學校轉學至日人子弟為主的新竹小學校。黃旺成在當時以局外人的角色，一方面支持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陣營所標舉憲政與民權等立論和價值，一方面又呼應日本當局為了推動內地延長主義而推行的共學制，大力促成長子轉入小學校共學，其立場看似矛盾，實則反映出日治時期臺人在面臨臺灣特殊性與內地延長的選擇時，所顯露擁抱近代文明卻拒斥走進日本民族框架內的複雜心態。1920年代後半期，黃旺成加入文化協會陣營和臺灣民報社，擔任講演團成員和記者，進一步將其新竹在地性的交友圈擴展為全島性的交際圈，也重新盤整他對臺灣島內、帝國日本、東亞大陸及世界重要局勢的認識。特別是他跨足政治社會運動不久後，文化協會就因左、右立場的對立而劃分成「新文協」和「臺灣民眾黨」兩股勢力，前者轉以階級鬥爭為運動方向，後者則成為接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幕後團體。如此的轉折，直令黃旺成再度發出「臺灣思想界分野」的感嘆。要言之，1920年代黃旺成由政治社會運動圈外進到圈內的過程中，最重要的社會觀察之一，便在於被統治者臺人一方的分化情形，即由1920年代初期親日派的「內地延長」與抗日派的「臺灣議會」在政治立場選擇上的對立，轉而到1920年代後期，成為「階級鬥爭」與「民族運動」在左、右思想光譜上的對立。

表一 黃旺成參與新竹青年會「通俗講演」一覽表

時間	地點	黃旺成講題	其他講題與聽眾狀況
1925.04.26 (竹聲會)	新竹公學校講堂	為什麼事要讀書	1.其他講題：石安勉，「衛生」、劉春木，「結婚問題」 2.前後有兩幕的活動影戲助興，會眾有五、六百人，因為生徒約有半數，所以不會靜肅
1925.04.27 (竹聲會)	新竹公學校講堂	無 (未登臺演講)	其他講題：張式毅，「社會連帶的意義」、蘇福，「女子教育的振興」、陳永石樹，「口腔衛生」、李良弼，「竹聲會的使命」
1925.05.30	新竹公會堂	不詳 (有登臺演講)	1.「新竹青年會」成立通俗講演會 2.聽眾有六、七百人，我的講演後漸漸減少，至十時閉會，所留者幾無一半
1925.07.04	新竹公會堂	不詳 (不知是否登臺演講)	1.其他講題：石安勉，「四大社會病」 2.雖州廳前有影戲，聽眾尚有四、五百人
1925.07.24	新竹公會堂	不詳 (最後登臺)	1.其他講題：張傑，「因時制宜」、洪石龍，不詳、張式毅，不詳 2.四、五百人之聽眾都熱心傾聽，將來新竹文化之向上可望也
1925.08.11	竹南媽祖宮	社會的責任者	1.其他講題：方泉松，開會詞、劉春木，「婦人問題」、李良弼，「民眾警察化」、蕭石基，閉會詞 2.聽眾三、四百人
1925.08.17	新竹市內媽祖宮 (西門)	過渡期的文化與 盂蘭盆會	1.其他講題：陳定錦，開會詞、張坤，「經濟與普渡」、張傑，「衛生與普渡」、石安勉，「不可自欺」 2.聽眾一、兩百人而已
1925.08.18	新竹關帝廟 (東門)	無 (未登臺演講)	1.演講者：洪石龍(開、閉會)、劉春木、鄭作衡、施女史、張式毅、胡桂林 2.聽眾滿座有四、五百人
1925.08.19	新竹公學校 (南門)	閉會詞兼講「理想與現實」	其他演講者：吳庚爐(主辦者)、張榜、黃瀛豹、蔡添貴
1925.08.20	新竹鄭氏家廟 (北門)	新竹的文化狀態	其他演講者：陳定錦(開會)、洪石龍、李良弼、戴良、石安勉、郭坤泉(閉會)
1925.09.26	樹林頭曾瑞堯宅 大庭	有意識的活動	1.其他講題：彭水金，開會、張坤，「農村經濟」、張式毅，「錢與人格」、李良弼，「科學與迷信」、林培銓，閉會 2.聽眾百餘人，最後不過四、五十人，大殺風景。而官廳有七、八人來，殊覺有趣
1925.10.24	新竹第一公學校 講堂	階級鬥爭	1.其他講題：鄭作衡：開會詞「為甚麼」、閉會詞「人生觀」 2.聽眾最多不過百餘人，最後剩一、二十人，很殺風景
1926.03.20	新竹市內媽祖宮	新舊道德	其他講題：洪石龍、李良弼，「勞働神聖」
1926.03.27	新竹市內媽祖宮	社會愛(閉會詞)	同一天文化協會新竹支部也在天公壇開文化講演(學金木、林冬桂主辦)而有所衝突
1926.05.13	新竹公會堂	司法	1.其他講題：李良弼，開、閉會、張傑，「立法」、張式毅，「行政」 2.互相以養成島民的政治思想為目的

1926.09.12	新竹公會堂	理智與情實	1.其他講題：張榜，「青年之意義」、張式穀，「文化改造」 2.七點五十分開會，聽眾共約二百人，至將十一時閉會。我和式穀各講一時十五分，於雨天得此成績也不能夠說不盛況了
1927.04.08	新竹公會堂	中國民眾運動	1.其他講題：鄭根煙，開會詞、吳萬來，「中國近況什談」、張式穀，「宿命觀與現代社會之缺陷」 2.本夜的聽眾為青年會演講未嘗有的盛況，樓上樓下皆滿員（千餘人）。鄭根煙自討開會辭，吳君講罷，聽眾退剩二、三百人而已，十時半閉會

資料來源：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 138-140、172、212-213、229-230、248、254-258、296、328；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一九二六年》，頁 107-108、112-113、176、314-315；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頁 132-134。

表二 黃旺成與新竹友人共組的學術研究會「修養會」一覽表

時間	值東者	地點	討論課題	課題討論情形
1925.04.03	黃旺成	黃旺成宅書齋	孫中山先生追悼會 組織研究會	1.追悼會流程：行三鞠躬禮、開會詞、捧讀史畧、弔詞、閉會、開茶話會，為先生懷慕談 2.定每月舊曆十六日開會一次，值東以年齡為序
1925.05.09	黃旺成	黃旺成宅書齋	題目「思想要怎樣善導」(黃旺成提出)	到會者：張傳、蘇福、江尚文、鄭作衡、張傑、曾瑞堯、張式毅、張忠
1925.06.06	張傑	張傑宅	題目「自由平等」	大張(張傑)的發表最有系統，黃旺成於日記裡摘要其說： 自由是不受外界的束縛 平等是無階級的質及無差別的待遇 自由平等是為要求人格的自我表現而生的
1925.07.06	張式毅	張式毅宅	張傑、江尚文、鄭作衡、張式毅，「文化」	式毅以「秩序」的研究而發表，內容之充分為諸論者冠
1925.08.05	張傳	客雅張傳宅	題目「自治」	悠悠往客雅赴傅君值東的第五回研究會，什麼萬兵圍、四川菜、雞筋、后里紅菇等珍奇佳味源源而來，更有取涼冰柱，此會到此已奢極矣。 自治之題不甚討論，夜半解散。次期值東戴良君，題擬「戀愛」
1925.09.03	戴良	新竹青年會	題目「戀愛」	戴良誤將エレン・ケイ(愛蓮·凱)的生殖論當作戀愛，式毅頗詳而無頭緒，我守默
1925.10.03	張榜	新竹青年會	黃旺成，「非孝論」	我受值東者的囑託發表非孝論的研究，先將孝的意義鮮明，然後摘出其不合於新倫理(戀愛、自由、平等)的所在。後有式毅說明非孝之後，愛與和何可適用的事，以外別無什麼議論。發表以前我先聲明我現時在煩悶時代，事事懷疑，以後要暫時修養，維持無主張的態度
1925.11.02	蘇福	蘇福宅	題目「新思潮」	食物豐富、談諧百出，全無半言談及學術，至此完全成了一個食會。予於食後極力主張要把宿題(新思潮)討議，竟被春木、張榜兩君破壞。最後乃有戴良君的風月話，齷齪難聽
1925.12.06	劉春木	劉春木宅	劉春木，「婦人解放問題」 張式毅，「植民政策」	八時入討論，主人無誠意，被予攻擊一番(婦人解放問題)。小張發表之植民政策，令人拜服
1926.01.09	鄭作衡	鄭作衡宅	劉春木，「勞動組合問題」 黃旺成，「佛蘭西革命史」(一時半)	夜在鄭作衡君家開學術研究會，春木發表勞動組合問題。宴會後(正式講席)，我發表佛蘭西革命史一時半久
1926.01.30	江尚文	江尚文宅	曾瑞堯，「改革」 張式毅，「生產的倫理價值」 討議「孟子與現代思想」	黃旺成於日記裡摘要： 生產是個性的表現(狹義的個性表現只限於文藝)，人的生活的樣式也是個性的表現，都在生產方面，若表現消費方面則是資本階級，所以招怨。故人生觀要以生產為目的、消費為手段，但勞動者的生產非個性的表現，故爭議
1926.02.28	黃瀛豹	黃瀛豹宅(泉興的貸家)	黃旺成、李良弼，「勞動和生活的問題」 黃瀛豹，「民族自決的研究」 江尚文，「東西思想比較」	

1926.04.15	洪石龍	北門外洪石龍宅	洪石龍，「農村問題」 戴良，「社會意義」	至五時半來會者計十人，他們打了兩回麻雀，七時上席，八時半起在其外庭開研究會。「農村問題」石龍說得很皮相，予為之補足，式穀亦述數言意見，戴良講十五分間的「社會意義」，十一時半解散
1926.05.10	曾瑞堯	曾瑞堯宅	討議風俗改良的事	怠氣滿，除卻乘涼、宴會以外，未嘗一言及於學術，可慨也夫
1926.05.27	黃旺成	黃旺成宅	無	在中庭乘涼閑談，研究會已成食會了。各釀出金要二次會，乃延之明晚
1926.06.26	張傑	不詳	不詳	黃旺成缺席
1926.08.13	李良弼	南寮	不詳	黃旺成缺席
1926.08.23	張式穀	張式穀宅	提議改造修養會條項	予獨反對其組織之不合理，想奈一般會員皆欲藉讀書會之名以達懇親之目的，是以仍舊通過式穀之議。予前已聲明退會，式穀泥予為客員，勉聽
1926.09.22	張傳	客雅張傳宅	題目「民眾政治」	下午三時半全傳、錦江往客雅張家，讀書會已開始討論民眾政治，都是搔不著癢，其中最堪噴飯者，戴良之把產業革命上的過程和諸主義拿來作闢論以展其博；式穀以民約論為精神，頗近似，惜運用不及自治
1926.11.20	洪石龍	不詳 (應為洪石龍宅)	不詳	1. (1926.11.19) 晚頃洪石龍來，調查明日讀書會出席之有無，說他明天是要用各食，是破天荒的浪費，這又何苦？ 2. 黃旺成前往霧峰、鹿港參與臺灣文化協會活動而缺席
1927.01.16	張榜	客雅張榜宅	題目「性的善惡」	下午往客雅赴榜的讀書會，互相討論性的善惡。結果善的一元說和善惡的二元說爭不得上下，可以說是多少的價值，十時過才散。
1927.03.06	蘇福	蘇福宅	題目「宗教」	讀書會對於宗教的討論皆不入題，撤席後頗有話氣，忽然榜及科學的音波，吳江因沒有科學的常識，所以鬧了一場好強辯一笑諧
1927.03.19	張坤	友聯機織工場	不詳	張坤值東，開例會於工場，討論很不徹底
1927.09.24	江尚文	江尚文宅	韓非子、帝國主義、民族心理	下午五時起在江宅開始讀書研究會，尚文(韓非子)、菊仙(帝國主義)、式穀(民族心理)，八時開宴，十時散會
1928.03.17	鄭作衡	鄭作衡宅	不詳 (最後的讀書會)	晚往作衡家赴末了的讀書會之一幕，出席者意外多數，連罕出頭的老李也到會。宴後在雅軒樓上戲排麻雀牌，至十時半乃回家

資料來源：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頁114-115、152-153、180-181、214-215、242-244、274、303、338、374-376；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一九二六年》，頁16、50-51、84、135-136、172、188-189、222、284、295-296、328、393-394；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四)一九二七年》，頁33-34、96、110、322-324；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五)一九二八年》，頁94。

表三 1925-1926年黃旺成參與臺灣文化協會「文化講演」一覽表

時間	地點	黃旺成講題	其他講題與聽眾狀況
1925.11.13	新竹市內媽祖宮	進步與保守	1.其他講題：葉榮鐘，「家族制度之一考察」、蔡培火，「宗教與人生」、戴雙喜，開、閉會 2.聽眾雖多而不太靜肅
1925.11.14	通霄媽祖宮	成人教育	1.其他講題：葉榮鐘，「輿論與現代政治」、蔡培火，「何謂文化」、詹安，開及閉會 2.聽眾千人，靜肅無聲
1925.11.15	苑裡媽祖宮	精神生活	1.其他講題：陳義方，開會、葉榮鐘，「經濟問題之一瞥」、蔡培火，「社會連帶」、陳煥珪，閉會 2.聽眾滿場，頗靜
1925.12.12	苗栗媽祖宮	自然征服與人生	1.其他講題：邱德金，「法治國」、葉榮鐘，「臺灣經濟」 2.聽眾兩千餘人
1925.12.13	大湖媽祖宮	農村文化	1.其他講題：邱德金，「文化運動」、彭華英，「世紀青年之使命」、莊垂勝，「現代生活」 2.聽眾約四千人，都從數里或十數里來者
1925.12.26	高雄臨水宮（順天聖母）	自然征伐與人生	1.其他講題：王受祿，「解放運動之根本精神」、蔡培火，「就臺灣宗教而言」 2.聽眾四、五百人，都靜肅
1925.12.27	鳳山媽祖廟	文化生活之意義	1.其他講題：陳逢源，「善政與自治」、蔡培火，「到自由之路」 2.聽眾千餘
1925.12.28	旗山媽祖廟	政治思想之涵養	1.其他講題：陳逢源，「民權與公論」、蔡培火，「到自由之路」 2.聽眾約有兩千，各相當發揮
1925.12.29	屏東關帝廟	文化之進程（一時二十分）	其他講題：陳逢源，「民生與思想」（四十分）、蔡培火，「地方自治之精神」（一時）
1925.12.30	潮州三山國王廟（初次）	農村文化之建設（一時二十分）	1.其他講題：陳逢源，「愛國之真義」（三十分）、蔡培火，「個人與社會」（一時） 2.聽眾千餘
1926.01.10	汐止天后宮	到幸福之道（一時三十分）	聽眾三、四百人
1926.01.11	松山講座	國民與政治思想（兩小時）	聽眾四、五百人
1926.01.22	新竹市內媽祖宮（新竹第八回文化講演）	廢退性之優越本能	1.其他講題：謝春木，「機會均等」、王敏川，「民眾文化之普及」 2.因友田警部無理解的注意，我興奮起來諷刺他幾句
1926.02.25	新竹市內媽祖宮	就內、臺人親善而言	1.林冬桂批評我的團結說明不足於民眾，是他欠閱歷 2.謝春木也來參加演說（最後一場）
1926.03.07	新竹市內媽祖宮	道德與法律	1.其他講題：王敏川，「社會奉仕的真義」 2.李傳興講十餘分就遭正式臨監
1926.03.11	公館五穀廟	法律上的自由平等	1.其他講題：鄭松筠，「文化上什感」、施至善，「臺灣青年的自覺」 2.聽眾二、三千人，到最後施至善君受正式臨監，即被中止
1926.03.12	汶水	到文化之路	1.其他講題：黃運元，開會、施至善，「社會病」、賴國美，「牧羊與牧民」 2.該處山水秀巖，人家數間而已，聽眾都是從遠方赴山過嶺來者 3.黃運元開會即受臨監中止，最後賴國美也中止，黃旺成、施至善無事

1926.04.20	宜蘭媽祖宮	法律上之自由平等	1.其他講題：謝春木，「組合之精神」、蔡培火，「地方自治」 2.聽眾約千人
1926.04.21	頭圍媽祖廟	警察與民眾	1.其他講題：謝春木，「文化運動之精神」、蔡培火，「地方自治」 2.雨很大，聽眾也有三百餘人
1926.04.22	羅東帝爺廟 (玄天上帝)	文化運動之精神	1.其他講題：謝春木，「輿論政治」、蔡培火，「地方自治」 2.聽眾千餘，挨擠不開
1926.04.23	三星舊製酒場	警察與民眾	1.其他講題：謝春木，「文協宗旨」、蔡培火，「社會生活之意義」 2.聽眾六、七百
1926.04.24	基隆玉帝廟	忠孝之真義	1.其他講題：謝春木，「組合精神」、蔡培火，「地方自治」 2.於大雨之下得滿場六、七百之聽眾靜聽
1926.04.27	新竹公會堂 (初回)	無 (未登臺演講)	其他講題：曾子敬，「畧談孔子之故事」、蘇維焜，「吾人之覺悟」、葉榮鐘，「新臺灣之經濟運動」、蔡培火，「地方自治之運用」
1926.06.03	新竹公會堂	因襲的生活	予占頭說明因襲生活的弊害，並主張對作醮的節約說，大得喝采，費一時餘畢
1926.06.28	新竹公會堂	紳士的態度	午後培火來竹，本夜在公會堂臨時開演會，冬桂來強要予出講，堅辭不得，出演約五十分間，大疲倦
1926.07.18	新竹公會堂 (女士文化講演)	無 (未登臺演講)	1.演講者：連溫卿、廖秋桂、劉英、李傳興(閉會詞) 2.聽眾千餘，末後殘者一半
1926.07.23	新竹公會堂 (廣東留學生團講演)	力與正義	
1926.09.05	新竹竹蓮寺	民眾化的社會	1.其他講題：戴雙喜，「自由鐘」、曾子敬，「自由鐘」、蘇惟梁，「現代社會的三要素」、林冬桂，「馬耳大王」 2.中途來臨監的鈴木(成雄)司法主任把我們的演說聘意注意中止，我很激昂，豫定明夜再開
1926.09.06	新竹竹蓮寺	社會勢力中心之推移	講了一時餘，喉嚨頗痛。雷雨九時半晴，聽眾盡出外庭，十一時無事閉會
1926.09.28	後龍媽祖宮	文化運動	1.其他演講者：曾子敬、黃運元、羅阿謹 2.午後一時半起在媽祖宮內開講演會，聽眾約有四、五百人。予第一次出講「文化運動」約一時間，滿身汗透出外衣。子敬講時受正式臨監，運元及羅阿謹過午三時頃才到
1926.10.09	新竹公會堂(文化協會新竹支部成立一週年紀念講演會)	精神與物質之比較	其他講題：連溫卿，「經濟之力」、鄭明祿，「國家之演進」、蔡培火，「對人三相」、陳煥珪，閉會
1926.10.17	新竹公會堂 (臺灣文化協會第六回總會講演會)	不詳 (不知是否登臺演講)	其他演講者：楊良(開會詞)、鄭松筠、黃周、邱德金、蔣渭水
1926.11.04	新竹市內媽祖宮	社會之進化	其他講題：周天啟，「廿世紀之社會生活」、郭戊己，「教育」
1926.11.22	鹿港街尾媽祖宮	社會中心勢力之推移	1.其他講題：鄭松筠，「法律須知」、葉榮鐘，「厚生之道」 2.聽眾雖多，因天氣很冷漸減

資料來源：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一九二五年》，348-352、380-384、398-410；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一九二六年》，頁18-20、39-40、81-82、92、96-99、140-152、158-159、196-197、224、244、249-250、306-308、335、347-348、356-357、378、396-398、431-432。

引用書目

《府報》

《臺灣》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民報》

《臺灣新民報》

〈臺灣雜誌社收款登記〉，「霧峰林家頂厝捐贈手稿」，編號：053。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黃旺成，〈黃旺成日記〉（未刊稿），1929-1930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王世慶（訪問）

- 1991 〈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收於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臺灣口述歷史》，頁71-114。臺北：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

永嶺重敏

- 1997 《雜誌と読者の近代》。東京：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

- 2004 《〈読書国民〉の誕生：明治30年代の活字メディアと読書文化》。東京：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

吳沁昱

- 2012 〈新竹市自治選舉與議會運作：以黃旺成政治參與經驗為中心（1935-1951）〉。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密察

- 1991 〈從日本殖民地教育學制看臺北帝國大學的設立〉，收於吳密察，《臺灣近代史研究》，頁149-175。臺北：稻鄉出版社。

吳叡人

- 2001 〈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臺灣人民族國家論述，1919-1931〉，收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頁43-110。臺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

李承機

- 2004 〈殖民地臺灣媒體使用語言的重層構造：「民族主義」與「近代性」的分裂〉，收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頁201-240。臺北：播種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2004 〈台湾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

李毓嵐

- 2012 〈林獻堂生活中的女性〉，《興大歷史學報》24: 59-98。

- 2013 〈1920年代臺中士紳蔡蓮舫的家庭生活〉，《臺灣史研究》20(4): 51-98。

周婉窈

- 1989 《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

彼得·柏克 (Burke, Peter) (著)、賈士蘅 (譯)

2003 《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林柏維

1993 《臺灣文化協會滄桑》。臺北：臺原出版社。

近藤正己、北村嘉惠 (編)

2014 《内海忠司日記 (1940-1945)：総力戦体制下の台湾と植民地官僚》。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 (編)

2012 《内海忠司日記 (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門新太郎 (編)

1925 《新竹州下産業統計商工業者案内》。新竹：新竹商工名簿録發行所。

紀旭峰

2012 《大正期台湾人の「日本留学」研究》。東京：龍溪書舎。

若林正丈 (著)、臺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 (譯)

2007 《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臺北：播種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荊子馨 (Ching, Leo T. S.) (著)、鄭力軒 (譯)

2006 《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張炎憲

1999 〈黃旺成的轉折：從社會參與到纂寫歷史〉，《竹塹文獻雜誌》10: 6-28。

連溫卿 (著)、張炎憲、翁佳音 (編校)

2003 《臺灣政治運動史》。臺北：稻鄉出版社。

張淑雅

2008 〈從日記看王叔銘的人際關係：蔣氏父子、僚屬與美軍〉，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上冊)》，頁123-166。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張園東

2005 《走進日治臺灣時代：總督府圖書館》。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

張隆志

2009 〈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臺灣史研究》16(4): 161-184。

張德南

1999 《堅勁耿介的社會運動家：黃旺成》。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莊永明

1990 〈輿論界的尖兵：黃旺成〉，收於莊永明、張炎憲、李筱峰編，《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五冊)》，頁85-99。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莊勝全

2011 〈腹有詩書氣自華？：黃旺成公學校教師時期的閱讀生活〉，收於川島真、松永正義、陳翠蓮主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第四集)》，頁269-302。臺北：稻鄉出版社。

許世楷 (著)、李明峻、賴郁君 (譯)

2006 《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俊雅

- 2014 〈知識養成與文學傳播：《黃旺成先生日記》（1912-1924）呈現的閱讀經驗〉，《東吳中文學報》27: 267-307。

許時嘉

- 2013 〈〈初山衣洲日記〉初探：日治初期在臺日人社會與日臺交流（1898-1904）〉，《臺灣史研究》20(4): 179-204。

許雪姬

- 2005 〈張麗俊生活中的女性〉，收於臺中縣政府文化局主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69-121。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
- 2013 〈跋：《灌園先生日記》全套廿七冊出版完成記〉，收於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廿七）一九五五年》，頁 493-504。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 2015 〈「臺灣日記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22(1): 153-184。

許雪姬（總編輯）

- 2008 《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上冊）、（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陳文松

- 2015 《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陳芳明

- 2006 《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陳培豐

- 2013 《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譯）

- 2006 《「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陳萬益

- 1999 〈臺灣報業史上的一等評論：論黃旺成的「冷語」「熱言」〉，《竹塹文獻雜誌》10: 29-40。

陳翠蓮

- 2008 〈想像與真實：臺灣人的祖國印象〉，收於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〇—一九五〇》，頁 179-222。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2013 〈大正民主與臺灣留日學生〉，《師大臺灣史學報》6: 53-100。

曾士榮

- 2008 〈一九二〇年代臺灣國族意識的形成：以《陳旺成日記》為中心的討論（1912-1930）〉，《臺灣文學學報》13: 1-64。
- 2013 《近代心智與日常臺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1912-1955）》。新北：稻鄉出版社。

許雪姬（主編）

- 2008 《黃旺成先生日記（一）一九一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嘉義：國立中正大學。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

- 2010-2015 《黃旺成先生日記（七）一九一九年～（十五）一九二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黃美蓉

- 2008 〈黃旺成與其政治參與〉。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黃麗雲

- 2011 〈日治大正期臺灣俗信與日本祝祭在臺施行情況：黃旺成的日記情境摸索與解析〉，《臺灣史料研究》38: 83-134。

黃繼文（口述）、陳鳳華（整理）

- 1999 〈父親黃旺成的追憶〉，《竹塹文獻雜誌》10: 41-57。

新竹市志編纂委員會（編）

- 1996 《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新竹：新竹市政府。

新竹州役所（編）

- 1933 《新竹州要覽：昭和八年》。新竹：新竹州役所。

新竹州（編）

- 1930 《新竹州第八統計書》。新竹：新竹州。

- 1931 《新竹州第九統計書》。新竹：新竹州。

- 1932 《新竹州第十統計書》。新竹：新竹州。

- 1933 《新竹州第十一統計書》。新竹：新竹州。

楊肇嘉

- 2007 《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第4版。

葉榮鐘

- 2000 《葉榮鐘全集1：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下冊。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 2000 《葉榮鐘全集2：臺灣人物群像》。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廖振富

- 2011 〈〈傅錫祺日記〉的發現及其研究價值：以文學與文化議題為討論範圍〉，《臺灣史研究》18(4): 201-239。

廖振富、張明權

- 2013 〈〈傅錫祺日記〉所反映的親人互動及其家庭觀〉，《臺灣史研究》20(3): 125-175。

臺中縣政府文化局（主編）

- 2005 《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

臺灣教育會（編）

- 1939 《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編）

- 1927 《臺灣總督府第二十九統計書（1925）》。臺北：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

鄭翼宗

- 1992 《歷劫歸來話半生：一個臺灣人教授的自傳》。臺北：前衛出版社。

鄭政誠

- 2009 〈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讀書生活〉，《兩岸發展史研究》7: 45-72。

興南新聞社（編）

- 1943 《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

Tzeng, Shih-jung 曾士榮

- 2009 *From Hōnto Jin to Bensheng Re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Social Observ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Intellectual Resources of Huang Wang-cheng in 1920s

Sheng-chuan Chuang

ABSTRACT

With reference to *The Diary of Ng Ong-Se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bservations, choices, actions and thoughts of Huang Wang-cheng in the 1920s and discusses how and why Huang, as a local Taiwan intellectual, engaged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movements initiated by overseas students from Tokyo. While everyone has different living environment,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thinking, through analyzing one's personal factors, life experiences and social contexts would shed light on how one would deal with and make choices in face of significant historical events.

In terms of personal factors, unfair treatments suffered by Taiwanese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were not only the main reason why Huang resigned from the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 but also inspired his strive for equality. Therefore, when Huang worked for Tsai Lien-fang's family in Taichung as a tutor and asset manager in the early 1920s, he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and supported the Taiwan Parliament Petition League Movement. Moreover, through the social network of the Tsai family, he became acquainted with the core members of the Movement such as Lin Hsien-t'ang. Huang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Hsinchu in 1925, thereafter served as a speaker of Taiwan Cultural Association and a journalist of *The Taiwan Minpao*. In this way, he could provide steady income for his family while pursuing his own ideals.

As for life experiences, Huang, when working in Tsai family, also made friends with Qian Ze-shen, a youth from Nanjing. His acquaintance with Qian fostered in him a habit to speak Mandarin and interest in vernacular literature. Qian also provided him knowledge of the situation in China. These life experiences later became invaluable assets for Huang when he got involved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movements, wrote article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then political situation in East Asia.

Regarding social contexts of the 1920s, first of all, *The Taiwan Minpao* containing articles primarily written in vernacular literary style grew into an important journal that

represented the aspirations of Taiwanese and instigated public opinion. Huang's creole writing style, which was a mix of vernacular Taiwanese, Japanese and Mandarin endowed him with an opportunity and a unique qualification for being employed by *The Taiwan Minpao*. Secondly, the 1920s saw a large number of libraries set up as 'reading facilities', a symbol of modern civilization. Against such background, Hsinchu Library of Hsinchu State became an important channel through which Huang gained access to new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What he learnt from reading was then passed onto the readers of *The Taiwan-Minpo* through the articles he wrote.

Keywords: Huang Wang-cheng, Social Observation, *The Taiwan Minpao*, Intellectual Resources, Reading Facilities